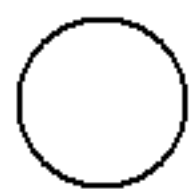


红旗

23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六一年第二十三期★

目 录

大力开展造林更新工作，合理利用
森林资源.....金 学 (1)

关于社会主义的經濟核算.....薛慕桥 (8)

美帝国主义在南越加紧进行軍事干涉.....郭济洲 (15)

杀气騰騰的“和平爱好者”袁先祿 (18)

总结和預見卞 征 (21)

学习常談.....謝觉哉 (24)

正确对待农村人民公社内部存在的
經濟差別.....何 予 (27)

試談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的級差地租钟成章 (32)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級差地租問題的討論 (39)

•



大力开展造林更新工作， 合理利用森林资源

金 学

森林是国家的重要资源，森林工业是基本原料材料工业部门之一。国家建设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都需要森林工业提供大量的木材。森林具有蓄水保土，防风护堤，调节气候的作用，同农业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增加森林面积和保持森林环境，是防止水旱风沙等自然灾害，保证农业丰收的一项根本措施。

我国森林资源不多。建国以来的十二年中，由于林业部门和林业企业职工的努力，由于开展了群众性的植树造林运动，特别是公社化以来，在人民公社和生产队领导下，集体造林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使我国的森林面积有了很大的增加；在同期中，采伐了近三百万公顷的森林面积，生产了近三亿立方米的木材，基本上保证了社会需要。所有这些成绩，都是十分显著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工业用材和农村、市场用材的需要量将会有更大的增长。这就要求各级林业部门，根据采育结合的方针，一方面加强森林更新工作，迅速恢复和发展原有的森林面积，并且积极营造新的森林，进一步增加森林资源的蓄积量；另一方面，合理地、有计划地进行采伐，千方百计地节约木材消耗，提高木材的出材率和商品率，充分地、合理地利用

用现有森林资源。

为了保证森林资源的永续利用，充分发挥森林保持水土、调节气候和防护的作用，促进农业丰收，必须进一步加强造林、育林工作，加速森林更新。解放以前，反动统治阶级只管砍伐，不管更新，使我国许多宝贵的森林资源，遭受破坏。解放以后，在中央规定的采育结合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的森林更新工作开始走上了正常的轨道。在三年大跃进中，为了适应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木材采伐量有了很大的增长，而更新速度增长得更快。三年中更新面积为过去八年更新面积的总和的三倍。为了使森林更新完全跟上森林采伐，和不断扩大我国的森林资源，必须继续贯彻执行采育结合的方针，随采随造，当年采伐，次年更新，并把旧的采伐迹地逐步地更新起来；同时，在宜林地，应该广泛发动群众，农林结合，积极造林。

在更新营林工作中，必须依靠群众，把专业管理和群众运动密切地结合起来。在国有大林区，采伐迹地的森林更新和抚育管理，营造新的森林，主要是由专门的营林机构和专业的营林更新队伍来承担。继续建立、巩固和充实更新专业队，积极培养营林技术力量，是保证国有林区更新营林工作顺



利进行的决定条件。但是在造林季节，也必须在保证质量的原则下，广泛发动群众进行营林更新。在专业营林机构的指导下，建立营林村，或者同人民公社订立合同，把一定范围森林面积的更新抚育工作，交给群众管理，也是依靠群众进行营林更新的好办法。分散的小片林区或者适宜于造林的荒山、荒地和河滩，森林更新和植树造林，应该主要依靠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组织社员群众来进行。人民公社和生产队根据多种经营的方针，把造林、育林工作同农业生产结合起来，通过封山育林、积极造林和林粮间作等各种方法，加速原有森林的更新恢复工作，并且因地制宜地发展用材林、防护林、油料林和果木林等，既能够从经营林业中获得收益，增加收入，又能够扩大森林面积，防止水旱灾害，促进农业丰收。广泛地发动社员群众，在村前村后，屋前屋后，路旁水旁，自留地和坟地上种植树木，对增加森林资源也有积极的意义。一家一户种的树木虽然不多，千家万户都来植树造林，就是一支巨大的力量。人民公社、生产队和社员群众的造林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我国广大农村的自然面貌就要起一个新的变化，农村烧柴、一般建筑用材和农具材，也就可以就地解决。所以，把国家、集体和群众的力量结合起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开展群众性的植树造林和营林更新工作，是贯彻执行采育结合，增加森林资源的根本措施。

坚持采育结合、育重于采的方针，必须使采伐方式和更新方式相适应。采伐方式的确定，既要有利于木材生产和合理经营，又要有利于森林更新和水土保持。皆伐出材量

比较大，成本也比较低，并且有利于人工更新。为了满足国家建设对木材日益增长的需要，在投资和劳动力充足的情况下，在地形、林型适宜的条件下，多采用一些皆伐，并在采伐后立即进行人工更新是适宜的。但是，我国每年采伐的森林面积这样大，不能全部依靠人工造林。为了使更新工作跟上采伐，避免造成水土流失现象，在相当一部分林子里，就应该采取择伐或者其他适当的采伐方式，进行天然更新或者人工促进天然更新。同时，在林区，总有一些不适宜于人工造林和应该进行天然更新的地方，也必须采取择伐方式，进行天然更新。因此，采用哪一种采伐方式和更新方式，都应该因地制宜，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不能只强调一种方式，完全否定其他的方式。

按照我国的具体情况，更新方式必须根据人力物力、土壤、气候和交通等条件，贯彻执行以人工更新为主，人工促进天然更新和天然更新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人工更新具有速生、高产、良种等特点。以东北和内蒙古林区为例，人工林十五年至二十年就可以疏伐，出木头，三、四十年就可以出坑木、电柱等重要原木，五、六十年至七、八十年，就可以出大直径的原木。人工林管理得好，平均每公顷出三、五百立方米木头甚至更多一些是可能的，比天然林要高得多。人工林还可以根据国家建设需要，考虑自然条件，合理安排树种比例，有计划地营造珍贵树种和速生树种。除了对采伐迹地进行人工更新以外，在无林、少林地区营造新的森林，对于增加森林资源，发挥森林的防护作用，都有积极的意义。



人工更新的标准自然要有所不同。有一般标准的，也有高标准的。应该选择土壤肥沃、上层较厚、坡度适宜、交通方便的地方，更多地使用投资和劳动力，营造丰产林。

为了提高更新效率，摆脱机器砍、人工栽的不相适应的被动局面，应该结合具体情况，试制出适合当地使用的更新机械。

在积极开展人工更新的同时，应该采用各种方式，促进天然更新。这样，既有利于恢复森林环境，又有利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最适宜于长树的地方进行人工更新。而且，在相当一部分采伐迹地，例如山脊陡坡和沼泽地带，干旱阳坡以及土层过薄的地区，只能采用轻度择伐方式，进行天然更新。

天然更新也要尽可能使用人工促进。人工促进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例如整地、火烧迹地、结合抚育管理进行间密补缺等等。应该进行多种试验，总结出在不同地区、不同坡向和坡度、不同树种的情况下，采取哪种促进方式最为适当。

当然，天然更新在树种选择上不可能也不应该像人工更新那样严格。红松、落叶松等针叶树固然很好，杨树、桦树等阔叶树长起来也是很好的生产用材和市場用材。

不论采取哪种采伐方式和更新方式，都要尽可能地保护幼树。对于人工更新来说，保留长得好的幼树，可以少种些树苗，可以节省劳动力，而且可以供应天然苗移植的苗源。对于天然更新来说，伐前更新幼树的多少更是天然更新好坏的重要标志。

不论采取哪种更新方式，都要重视更新质量，都要加强对幼树的抚育管理，保证成林。对于那种片面追求数量、不重视更新质

量，只管栽、不管活，只管更新、不管抚育的错误做法，应该坚决地反对。

对天然次生林加强抚育管理，是我国营林工作中应该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我国天然次生林分布很广，面积很大。以我国最大的林区东北、内蒙古林区来说，现有的天然次生林的面积，接近这个林区森林总面积的一半。这些次生林大多数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大量掠夺采伐以后新生的幼壮林，也有一些是火灾后天然更新起来的或者荒山荒地上生长起来的幼壮林。它们大体上是以阔叶树为主的混交林，分布在交通比较方便，地势比较平坦，土质比较好的地区，是国家重要的森林后备资源。应该对这些天然次生林进行调查研究和勘察设计工作，做出全面规划，建立经营管理机构，或者包给农村人民公社，认真地进行经营管理。现有各林业局和林场，对所管辖的森林面积中的次生林，也应该加强抚育管理工作。经过抚育管理，次生林可以提前成材，对增加我国森林资源的蓄积量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在抚育采伐中，还可以生产一部分木材，供应国家和人民群众的需要。

营造专用林是我国营林工作中出现的一个新事物。在矿山、造纸厂、纤维厂附近，利用荒山荒地建立专用林场，或者把厂、矿附近的林场划为专用林场，在铁路沿线，种植枕木、电柱用材林，既可以保证厂、矿用材和铁路维修用材的需要，又能够节省运输，是应该积极推行的。

正确地贯彻执行采育结合的方针，贯彻执行人工更新和天然更新相结合、而以人工更新为主的方针，贯彻执行专业管理和群众



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加强育林、造林工作，并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人民公社、生产队和社员群众进行广泛的植树造林，我国的营林更新工作将会进一步地发展，我国的森林资源将会逐渐增加。这样，就能够进一步满足社会对木材的需要，并且充分发挥森林对促进农业丰收的作用。

随着社会需要的不断增长，在增加森林资源蓄积量的同时，必须继续努力节约木材消耗，提高木材的出材率和商品率，充分地利用现有森林资源。

在坚持合理采伐的基础上，把伐区的大木头拿下山来，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把小木头也拿下山来，满足农村和市场的需要，这是充分利用森林资源的两个重要方面。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修建厂房舍需要建筑用材，建筑铁路需要枕木、电柱，兴办煤矿需要坑木。这些都是径级较大的原木，是从生长了几百年的森林中砍伐下来的。人工营造的森林，要取得原木，在高原和高寒地区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在长城以南也需要三十年到四十年。这就要求林业职工必须十分爱护森林资源，采取一切合理措施，千方百计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原木的出材率和商品率，力求在每一公顷的成熟林和过熟林中，取出尽可能多的原木，供应国家建设日益增长的需要。

社会需要是多方面的，既需要径级较大的原木，也需要各种各样的小规格木材。我国农村是一个消费木材的巨大场所。就拿制造车辆、犁杖、扁担、锄把、镰刀把、鋤头把等农具用材来说，每年全国就需要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立方米小规格木材。农村修建房舍，

需要大量的椽子、檩条等各种小规格建筑材。六亿五千万人民日常生活也离不开木材。制造小家俱、擀面杖、洗衣板、锅盖、案板用的木材，和许多家庭日常需用的引火柴，数量也很大。如果对农村、市场所需要的小规格木材的生产和供应注意得不够，就会影响农业生产，就会使城乡居民感到不方便，而且会造成“大材小用”的不合理现象。因此，结合原木生产和森林抚育以及天然次生林的开发利用和抚育管理，尽可能把小木头也拿下山来，供应农村和市场需要，是一件关系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大事，也是充分利用森林资源，节约原木消耗的重大经济措施。

解放以后，林业部门在中央和各地党委的领导下，彻底改变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对森林的乱砍滥伐现象，依靠广大林业职工对企业进行了根本改造，并且制定了一系列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技术规程，使森林资源得到比较合理的利用。但是，由于管理工作跟不上生产发展的要求，这些好的规章制度和技术规程没有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有的执行了一个时期，后来又放松了。因此，仍然存在着不少浪费资源的现象。例如，伐根超过了规定的高度，造材制材不完全合理，在集材、归楞、装卸、运输等各个生产环节里，还丢失了不少木材。特别是小规格木材生产，在林区有些地方虽然已经引起注意，但是还没有引起普遍的重视。这种损失和浪费现象，必须认真地加以纠正，使森林资源进一步得到充分的利用。

为了纠正木材生产中的丢失和浪费现象，把可以拿出的大、小木头都从山上拿下山来，必须在林业职工中进行广泛深入的充分



利用森林资源的教育，提高林业职工爱护森林资源的自觉性。要使每一个职工都懂得，国家建设每年需要几千万立方米的原木，农村和市场每年需要几百万立方米的小规格木材，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是全体林业职工应尽的责任和光荣的任务。只要我们每一个职工在工作中认真负责，精打细算，严格地按照伐区设计进行采伐，认真地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和技术规程、操作规程，在生产各个环节中尽量减低损耗，不丢失和浪费木材，把应该拿到的每一立方米木头都从山上拿下来，就可以大大提高木材的出材率和商品率，生产更多的原木和小规格木材，进一步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

认真执行合理的规章制度是坚持合理采伐、提高木材出材率和商品率的重要保证。建国十二年来特别是大跃进的三年来，各级林业部门和林业企业，在总结生产实践和群众运动的丰富经验中，已经逐步摸到了林业生产存在的一些规律性，初步建立了一套合理的规章制度，如党委领导下的局长负责制，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制度，伐区移交和验收制度，伐区工艺设计制度，产品入库和验收制度，检尺制度，各种技术责任制度等等。这些科学的管理制度，规定了木材生产中各个方面应该担负的责任，在生产各个部门和各道工序之间，起着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作用。这些合理的规章制度，在今后的生产实践和不断总结经验中，还要进一步完备起来。认真执行这些合理的规章制度，生产就能够有节奏地进行，每道工序、每项工作就都有专人负责管理，就能够做到把伐区里能够砍、应该砍的大、小木头

全部采伐下来，把采伐了的木头全部拿下山来，减少以至完全杜绝浪费现象，从而提高木材的出材率，增加商品材。

提高木材生产的机械化程度，是提高木材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商品材的关键问题。木材生产是笨重的体力劳动，劳动强度很大，占用劳动力很多。在手工劳动比重过大的情况下，在集材、装卸、运输等生产环节中，有些比较难拿的木头就容易发生丢失和浪费现象，使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这种情况在任务紧急时更容易发生。随着国家建设对木材需要量的日益增长，木材生产任务还要逐渐加大。在我国社会主义企业中，增加生产的主要办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源利用率，增产不增人。因此，必须提高木材生产的机械化程度。木材生产所需要的设备，在采伐方面主要是油锯，在集材、装卸方面主要是拖拉机和绞盘机，在运材方面主要是汽车、森林铁路的机车和台草。此外还需要中小型发电设备、检修设备和筑路等方面的设备。这些设备目前我国都能够生产。因此，不断补充这些方面的设备，并且加强设备的维护检修，以充分发挥设备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我国木材生产的机械化程度是完全有条件的。在提高机械化程度的同时，还必须继续深入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充分利用天时、地利和冰、雪、水等自然条件，因地因时制宜地推广各种新工具，大力发展半机械化作业，以补充目前机械的不足。

正确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工资政策，切实改善林区的职工生活，对于鼓励林业职工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发挥职工生产积极性有重要的意义。工资是分配的主要



形式。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生产关系处理得适当，会促进生产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生产的发展。我国的主要林区大都分布在边远偏僻地带，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同时木材生产是山场作业，劳动强度很大，因此国家对林业职工规定的工资是比较高的。各级林业部门必须根据林业生产的特点，认真地研究工资政策，使工资分配得合理，以充分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定额是工资的基础。不论是实行计件工资的工种，或者是实行计时工资的工种，都应该根据技术装备的程度，作业条件的好坏，付出劳动量的多少，定出合理的劳动定额。例如，生产小规格木材，在采伐、集材、装卸、运输等各道工序中，都比生产原木费工。因此，小规格木材生产的各工种，劳动定额就应当比原木生产低些，不然就会影响工人生产小规格木材的积极性，那些适宜于生产小规格木材的资源就不能充分利用。又如，在原木生产中，应该根据采伐的难易，距离的远近，作业条件的好坏，规定合理的定额。如果定额不合理，工人经过努力还达不到定额，那末他们就可能尽量拣容易采的、出材多的树采伐，拣距离近的、地形好的木头集材，拣集中的、装车方便的木头运输，而把那些采伐费工的、出材少的树，和过大过小的、集材和运输不方便的木头留在山上。

根据林区工作艰苦的情况，国家规定有林区津贴制度。林区津贴也应该分配得合理。如果把直接参加生产的工段工人和进行野外作业的职工的林区津贴分配比例适当提高一些，对鼓励职工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将起到有益的作用。此外，为了调动老工

人的积极性，发挥老工人在生产中的骨干作用，应该研究出一个合理的鼓励老工人的办法。

在生活物资的供应方面，国家对林区的供应素来是比较充足的。虽然在连续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农业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生产遇到暂时困难的条件下，国家对林区职工也还作了适当的供应。各级林业部门应该认真负责地把这些物资进行合理的分配。

适当调整原木和小规格木材的价格，对于把大、小木头都拿下山来，有重要的作用。生产小规格木材比生产原木用工多，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在工资定额规定得合理的情况下，小规格木材的收购价格必然比原木要高些，否则就不利于调动林场生产小规格木材的积极性。但是在销售的时候，考虑到规格大小、材质好坏，小规格木材的销售价格却应该比原木低些，这样才不会“大材小用”，使森林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这就要求林业企业在保证工人不降低工资收入的条件下，尽可能降低一些小规格木材的成本，从小规格木材生产上少得些利润，国家对企业生产小规格木材尽可能给以扶持；而在另一方面，国家可以适当调整原木的销售价格，从原木销售中多得到一些积累，企业也可以从原木生产上多提取一些利润。这样，原木和小规格木材的价格定得合理，工人和企业既愿意生产原木，也愿意生产小规格木材，各方面的积极性都会调动起来，大、小木头都会拿下山来。

从大木头上多得些利润是有理由的。木材生产同其他生产不同。经营树木，在山上



要生长几十年甚至百多年才出原木，而庄稼至少一年可以收割一次，一般工业产品的生产周期就更短了。国家从原木生产上多提取一些利润，大木头赚了钱，可以修铁路，盖房子，买机器，发展国家建设（包括林业建设）。同时原木成本中的更新营林费用也可以适当增加，这样就可以多造些林，增加森林资源的蓄积量。

对林区生产、生活用材实行有计划地使用，是合理利用森林资源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林业企业生产和林区地方建设总要用一部分木材，林区几百万人吃饭、取暖，总要烧掉一部分木材。但是，如果不按消耗定额和材种有计划地控制使用，需用的时候就上山去砍，势必造成森林的乱伐和木材的浪费。因此，把企业生产和地方建设需用的木材，纳入计划，经过批准使用，是保护国家森林资源的一项必须采取的重要措施。林区烧柴数量很大，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妥善解决。例如，有计划地砍伐枯立木，生产一部分烧柴，在采伐和加工过程中，将不能利用的枝桠和剩余物供应职工和居民作为烧柴，组织职工家属和居民采割灌木、茅柴等等，都可以节约好木材。拨出一定面积的林地给人民公社经营薪炭林，也是防止随意砍伐森林的一项措施。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供应部分煤炭作为燃料，把木材节省下来是合算的。为了防止烧掉好木头，应当合理规定烧柴价格，好木头价格应该定得高，枝桠废材价格应该定得低。

除了用各种办法，从各个方面节约木材消耗，增加木材生产以外，进行木材的综合利用，有计划地发展人造板工业和林产化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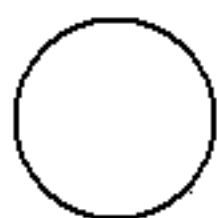
工业，也是充分利用森林资源的一个重要方面。把原木压制成胶合板和压缩木，不仅经济价值大大提高，而且改变了原有的物理性能，成为许多重要工业部门的高级原材料。把木材生产和加工过程中没有利用的剩余部分，如废材、树皮、锯屑等作为原料，制造纤维板，提炼栲胶、酒精等，或者从松根中提炼松香，利用价值也会大大提高。所以，从长远的方向来说，应该逐步发展木材的综合利用。当然，木材综合利用在投资和技术等方面都有些问题需要解决，必须根据当前的条件和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

更新造林和资源利用是我国林业工作中两个根本性质的问题，它们之间又是互相联系的。坚持合理采伐的原则，千方百计地节约木材消耗，充分利用森林资源，不仅可以比较好地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可以节约森林资源，减少采伐面积，使森林更新和森林采伐保持适当的比例。加强更新造林工作，恢复和发展森林面积，既是防止自然灾害、促进农业丰收必须采取的一项根本措施，也是不断增加资源蓄积量，顺利实行按轮伐期组织木材生产，保证森林长期经营、永续利用的根本措施。因此，妥善处理更新造林和资源利用问题，是我国林业工作的严重任务。发展林业是国家的百年大计，林业工作做得好还是不好，不仅关系当前的国计民生，而且对子孙后代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依靠全国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有一切有利条件改造自然，发展林业，使我国的森林资源在不长的时间里大大增加，以造福于社会和人民。



关于社会主义的經濟核算

薛 暮 桥



社会主义經濟核算的任务，是計算劳动的經濟效果，通过它来节约劳动(活劳动)消耗和物资(物化劳动)消耗，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和物资消耗，生产出尽可能多、尽可能好的社会产品(使用价值)，来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馬克思曾經指出：节省劳动時間以及在各个生产部門中有計劃地分配劳动時間，是以集体生产为基础的首要的經濟規律。社会主义社会通过国民經济計劃来保证劳动時間(包括物化劳动)在各生产部門之間进行合理分配，并且通过經濟核算来促进劳动時間的节约，用同样数量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生产出更多的社会产品。社会主义社会在制訂和执行国民經济計劃的时候，必須借助于經濟核算，来努力节约劳动時間的消耗，否則，就不能保证生产的高速度发展。

經濟核算就其广义来讲，不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而且在資本主义条件下也存在。但是，社会主义的經濟核算，与資本主义的經濟核算的性质根本不同。首先，資本主义的經濟核算，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的高額利潤。从这样的要求出发，往往使大量工人失业，大量机器設備閑置起来，甚至銷毀一部分

社会产品。这些疯狂的措施，在資本主义社会里被认为是“經濟”的，因为它能保证资产阶级取得比較多的利潤。社会主义的經濟核算，是为着生产更多更好的社会产品，来更充分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它要求最充分最合理地使用全部劳动力、机器設備、原料、材料、燃料和資源等，使它們能够發揮最大的經濟效果。

其次，資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生产資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的，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独立的、自負盈亏的經濟单位；从整个社会來說，生产是无組織、无計劃地进行的。所以，資本主义国家只有企业的經濟核算，而沒有整个国民經济的核算。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生产資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的，为着管理这样龐大的、复杂的經濟結構的一切經濟活动，必須采取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办法；既有国家的統一計劃、統一管理，又有企业的独立經營、独立核算。社会主义社会的經濟核算，不但有企业的經濟核算，而且还有整个国民經济的經濟核算。

在社会主义国家，国营企业的生产資料和产品是归全民所有的，由国家統一管理；同时，国家把一部分管理的权力下放給企业，每一个国营企业，都是一个独立的核算单位。社会主义国家把一定数量的固定資產和流动



資金交給各个国营企业，让它們在国家计划的統一领导下，各自独立經營、独立核算。企业在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資料和支付的劳动报酬，必須依靠自己出售产品的收入来补偿。此外，还必须有一定数額的赢利，作为国家和企业的积累。企业經濟核算是編制国家计划和进行整个国民經济的經濟核算的基础。但是，企业核算又必須服从国家计划所提出的要求，企业的利益必須服从整个国家的利益。

經濟核算不但在社会主义阶段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到将来的共产主义阶段，仍然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共产主义阶段的經濟核算，同社会主义阶段的經濟核算可能有若干区别。例如，社会主义阶段各种产品的价值，要用货币的形式来表现，必須通过货币来进行核算。到了共产主义阶段，由于产品不再通过价值形式表现，因此，經濟核算就不必再用货币的形式了。不过，那时的經濟核算的基本要求（节约劳动消耗和物资消耗），和社会主义阶段还是相同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經濟核算所以必須采取货币的形式，主要由于在这个时期还存在着两种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在两种所有制之間互相交换产品的时候，在劳动者用自己的劳动报酬换取所需要的消費品的时候，都需要采用商品货币形式，进行等价交换。而且整个国民經济是相互联系的，即使在各国营企业之間，也还必须通过货币来互相交换它們的产品。在社会主义社会，利用货币形式来进行計算，是符合客观經济发展过程的要求的。如果各种产品的价格同价值基本一致，那末，采取货币形式所进行的經濟核算，就可以比較准确地反映生产中的劳动消耗、

物资消耗和劳动的經济效果。

但是，作为商品生产，价格同价值的一定程度的背离，是难于完全避免的。这种情况，必然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經濟核算的准确性。社会主义国家为着正确执行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的原则，为着保证經濟核算的正确进行，在一般情况下，都有必要尽可能使各种产品的价格同它所反映的价值基本一致。因此，我們的經济管理工作人員就有必要很好地研究价值規律，正确地确定各种产品的价格，尽可能提高經濟核算的准确程度。

在用货币的形式来进行經濟核算的时候，如果产品的价格变化，就会使各个时期的計算資料难以互相比較，因而也会影响到經濟核算的准确程度。为着避免这种缺点，社会主义国家制訂产品的不变价格，使它所計算的产值能够准确地反映各个时期生产的增长速度（如果某些产品沒有不变价格，也可以用物价指数来排除物价变动所产生的影响）。但是，不变价格同实际价格的背离，会使我們用不变价格計算的产值，同必須用現价計算的財政收支、投資、产品成本等指标不一致，这样，就为計算带来許多困难。这里可以看到，利用货币形式来进行經濟核算，常常会遇到价值和价格的矛盾。虽然如此，在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主义社会，采取货币形式来进行經濟核算仍然是必要的，是不可避免的。

二

社会主义社会的經濟核算，包括生产中的經濟核算（主要是劳动成果和生产成本的核算），和建設中的經濟核算（主要是投資



效果的核算)。前者保证现有生产能力的合理利用,发挥最大的经济效果;后者保证用尽可能少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创造出尽可能多的新的生产能力。

生产中的经济核算,首先需要计算劳动成果,主要是计算产品的产量和产值。由于企业的产品是多种多样的,不易互相比较,因此,产值是最能表示企业劳动成果的综合性指标。总产值包括全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即包括:职工新创造的价值,从原料、材料、燃料的消耗和机器设备折旧等形式转移到产品中来的价值。如果要计算职工新创造的价值,还必须计算纯产值,即在总产值中剔除上面所说的在生产过程中转移过来的价值。从全国范围来讲,总产值有许多重复部分,必须计算社会产品的纯产值(即国民收入),才能正确反映这一时期全国劳动人民新创造的物质财富。

在企业的经济核算中,除计算劳动成果外,更重要的是计算生产中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生产中所消耗的物化劳动(原料、材料、燃料的消耗和机器设备的磨损等),归根到底也是本企业或其他企业的活劳动的成果;但是,这两者必须分别计算。生产中活劳动的消耗同它所创造的产品数量之间的比率,就是劳动生产率。通过经济核算来节约生产中活劳动的消耗,也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它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劳动生产率可以按实物计算,比如,一个工人一年生产多少吨煤,或生产多少件纱等;也可以按货币计算,比如,每一个工人一年创造多少总产值或纯产值。要研究生产许多种产品的整个企业、整个行业或者研究

整个工业部门的劳动效果的高低,就不可能按实物计算劳动生产率,而只能按货币计算劳动生产率。按货币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可以按总产值计算,也可以按纯产值计算。

经济核算的任务,除节约活劳动的消耗外,还要节约物化劳动的消耗。在大多数工业产品中,物化劳动比活劳动占更大的比重(在我国一般约占三分之二)。一般说来,生产的机械化程度愈高,物化劳动所占的比重就愈大。所以,物化劳动的节约,在经济核算中同样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这方面,可以用实物计算,比如,发一度电消耗多少煤炭,纺一件纱用多少棉花。为着计算一件产品所消耗的各种物化劳动的总和,就只能按价值形式来计算。在物化劳动的消耗中,原料、材料、燃料的价值,在一次生产过程中全部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了,计算起来比较容易。机器设备的价值,要在许多年中逐步地转移到新产品中去。每年机器设备的损耗,用折旧的形式计入产品的生产成本。

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节约,表现为产品的生产成本的下降。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总和,就是产品的价值。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又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支付给职工的工资,二是出售产品后的赢利(包括税款在内)。转移到产品中的物化劳动的价值,加上活劳动中的工资部分(包括行政管理费用),就是产品的生产成本。产品的出厂价格(相当于产品的价值)除去生产成本就是赢利。由于产品的出厂价格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所以,某一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如果消耗了比较少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那末,它所获得的赢利就比较多,它的赢利率就比较高;拿两个条



件相同的企业来比較，这个企业的經济效果就比較高。当然，各个企业的技术装备（机械化程度）和原料、燃料供应（是否接近原料、燃料产地）等客观条件不尽相同，条件比較好的企业，生产成本就比較低，赢利就比較多。所以，国家对客观条件不同的企业，提出不同的成本和赢利的要求。同时，企业必須在完成生产計划（包括产品产量、产值、品种、規格、质量等指标）的基础上来降低生产成本，不容許为着追求赢利而改变国家的生产計划。

社会主义国家要求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节约物化劳动的消耗等办法，来不断降低各种产品的成本，增加企业的赢利。企业的赢利，是社会主义国家财政收入和积累的主要源泉。所有的国营企业，都有責任完成国家的生产計划，并向国家上繳一定数額的赢利。当然，在特殊的情况下，国家可以指定个别企业生产某些亏本的产品，也容許个别企业在一定的时期内进行亏本的生产。但是，总的来說，企业的亏本不但会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会减少国家物质财富的积累。因为在成本中，不但物化劳动部分是物质财富的消耗，工資部分同样也是物质财富的消耗（职工要消耗同工資相等的消費品），亏本就意味着生产中取得的物质财富，还不能抵偿生产中消耗的物质财富，社会的物质财富积累将要因此而有所减少。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的国营企业，都应当努力完成国家的生产計划和赢利計划，尽可能避免亏损。

企业的經济核算，还应当計算赢利率的高低。赢利率有按产品計算的赢利率和按資金計算的赢利率。按产品計算的赢利率，是計

算赢利在某一种产品的产值中所占的比率，也就是赢利和成本各自所占的比例。国家研究生产同一类产品的各个企业的成本和赢利的高低，或者研究同一企业生产同类产品在各个时期的成本和赢利的高低，鼓励各企业努力降低成本，增加赢利。赢利率同价格有着密切关系，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成本下降，同时，也就是赢利率的上升。如果价格变化，赢利率也会跟着变化。国家为着研究价格政策，也需要比較各种不同产品的赢利率的高低，从中发现哪些产品的价格偏高或者偏低。国家根据这样研究的結果来調整各种产品的价格，可以更有效地利用价值規律来为我們的經济建設事业服务。

社会主义国家为着最充分最有效地利用全社会的生产基金，除按产品計算赢利率外，还应当按資金（包括固定資金和流动資金）来計算赢利率。按資金計算的赢利率的高低，除决定于产品赢利率的高低外，还决定于資金的周轉速度。資金实际上是企业的固定資產（机器、設備、厂房等）和流动資產（备用的原料、材料、燃料和半成品等）的貨幣形态，資金周轉率的高低，反映着企业的固定資產和流动資產的利用率的高低。两个企业如果产品的赢利率都是百分之二十，甲企业的資金每年周轉一次，乙企业的資金每年周轉两次，那末，按資金計算的赢利率，甲企业是百分之二十，而乙企业則为百分之四十。各个不同行业由于資金的有机构成不同，資金周轉率的快慢也不同。比如重工业的机器設備較多，所以，它的資金周轉一般来說比輕工业要慢一点。我国按产品計算的赢利率，重工业稍高于輕工业，而按資金計



算的贏利率，則輕工業又稍高于重工業。這說明贏利率的兩種計算方法各有各的作用，對經濟核算都有重要意義。

三

社會主義國家不但必須在社會產品的生產過程中認真地進行經濟核算，而且必須在建設過程中認真地進行經濟核算。也就是說，必須對每一項建設計劃，認真地計算投資的經濟效果。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建設，目的是要：一，增加新的生產能力（各種生產設備），以便在提供相適應的勞動力和其它必要條件的時候，能夠生產出更多的社會產品；二，提高勞動者的技術裝備水平，以提高他們的勞動生產率，使同量的勞動能夠生產出更多的社會產品；三，依靠技術裝備水平的提高來降低生產成本，增加贏利，為國家積累更多的資金，來進行更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所以，建設過程中的經濟核算，比生產過程中的經濟核算更加複雜，需要把若干種計算結果互相比較，才能確定在什麼條件下，什麼樣的建設最符合於多快好省的原則。

計算投資效果可以按實物計算，也可以按貨幣計算。比如增加年產一萬噸煤的生產能力、或者年產一萬噸鋼的生產能力需要多少投資，增加一萬瓩發電設備、或者一萬個紗錠需要多少投資，這都是用實物計算的投資效果。各個建設項目由於客觀條件不同，所需要的投資是不同的。例如，在資源條件不同的地區建設同樣規模的煤礦，或在地形不同的地區建設同樣長度的鐵路，所需要的投資就多少不同。一般來說，投資省、成本低的建設項目最符合於節約的原則。

按貨幣來計算投資效果，就是計算在這個項目建成以後每年的總產值、純產值、贏利數額同投資數額之間的比例。由於總產值包含着從別的企业轉移過來的價值，所以，不如按純產值計算比較恰當。按純產值計算的投資效果，說明某一個建設項目在建成以後，每萬元投資每年能夠使國家增加多少國民收入。同樣數量的投資，建成後增加的國民收入愈多，投資的效果就愈大。按贏利計算的投資效果，也就是投資的贏利率。如果某一建設項目投資一億元，在建成以後每年能使國家得到兩千萬元的贏利，那末，投資的贏利率就是百分之二十。根據投資的贏利率，可以計算出投資的回收時期。如果投資的贏利率是百分之二十，那末，投資的回收時期就是五年。也就是說，國家可以用五年的贏利，收回其全部投資，或者再建設一個同樣規模的新企業。

計算投資效果，還需要計算新建成的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和生產成本。同樣建設一個一萬瓩的電站，建火電站投資可能比較節省，但是，建成後勞動生產率比較低，成本比較高，按產品計算的贏利也比較少。如果建水電站，情況就與此相反。水電站的投資比火電站多，但是，建成後的勞動生產率比較高，成本比較低，因而贏利也比較多。

建設時期的長短，也是必須考慮的問題。因為在建設時期中，投資是不能發揮它的經濟效果的。仍以水電站和火電站為例，水電站的建設時間比火電站要長，發揮投資的效果的時間比較遲，從這一點來看，它又不如火電站了。這樣，從長期看，可能建設水電站比較有利；從短期看，可能建設火電



站比較有利。當然，各个地区的資源情况是不同的，有些地区有丰富的水力資源，具有建設水电站的良好条件；有些地区煤炭資源丰富，适宜于建設火电站。而且在兴建水电站和火电站的时候，还有许多复杂因素需要考虑。因此，究竟兴建水电站还是兴建火电站，要根据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按最合理最節約的原則来作决定。

投資的地区分布是否合理，对投資的經濟效果影响很大。各地区的資源多少不同，鋼鐵工业最好建立在有着丰富的铁矿和煤矿的地区，紡織工业最好建立在盛产棉花的地区。这样，建成以后生产成本就比較低；但是，兴建企业只考虑接近原料、燃料产地，而不考虑产品接近消費区域，使各行各业的生产过分集中在少数地区，那也是不适当的。各地区一方面必須根据客观条件，实行分工协作；另一方面又必須在条件許可的情况下，經營多种生产事业，尽可能地依靠自己生产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国家应当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制訂各地区之間的分工协作、互通有无的全面规划。各地区自己也应当因地制宜，制定发展地方經濟事业的全面规划，逐步建成程度不同、各有特点的比較完整的經濟体系。

投資效果不仅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而且还受历史形成的社会經濟条件的影响。一般来讲，在老工业区建設工业企业，投資比較省、收效比較快；扩建老工厂，一般也比建設新工厂投資省、收效快。但是，过多地在老工业区进行建設，将使工业过分集中，經濟发展的地区間的不平衡更加扩大，从全局看，从长期看，显然是不利的。因此，国家需要利用老工业基地的生产力量，来有计划

有步驟地建設新的工业基地。

計算投資效果的时候，还应当考虑当前我国的技术标准。如果我們的建設項目采用較高的技术标准，即較高的机械化、自动化，建成以后，劳动生产率就比較高，产品的成本比較低，贏利也比較多。但是，从另一方面考虑，这样的建設投資比較多，建成的时期比較长，加以我国的重工业还不很发达，建設所需要的材料和設備的供应也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我們的建設計劃，必須采取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針。采用現代技术的大型企业，是我們建設的骨干；但同时必須根据机器設備等供应的可能、地质資源的情况以及其他因素，建設較大数量的、机械化程度还不高的中小型企业，然后从小到大、从土到洋，逐步提高。这样，才符合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

建設的技术标准，在各个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时期，考虑的重点是不同的。在重工业特别发达的国家，机器設備的供应比較充足，劳动力則感到缺乏，那末，比較迅速地提高工人的技术装备，以更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应当采取的方針。我国目前重工业还不很发达，不可能提供很多的机器設備，不可能太快地提高工人的技术装备，暂时还只能采取机械化、半机械化、手工劳动同时并举的方針，随着重工业的发展，才能把我国的技术水平逐步提高。特别是我国的农业生产，目前还只能够以手工劳动为主，逐步地实现机械化、电气化。如果不考虑客观条件，过急地实行机械化是做不到的。反之，在机械化程度已經很高的工业部門，例如紡織工业，再提倡土法生产，不但会大大地降



低劳动生产率，而且会提高产品的成本，降低产品的质量，这自然也是不适当的。

四

我們的經濟核算的目的，是要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在多快好省中，省要通过經濟核算来实现，这是容易看得到的。省同多快好是不可分割的，通过經濟核算来节约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并不是要把这些活劳动和物化劳动闲置不用，而是为着用同量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創造出更加多的社会产品。所以省和多，实际上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社会产品愈多，生产的发展速度愈快。多快和好也是密切联系着的，质量比較好的东西，它的使用价值比較高，一件产品可以抵两件，这样，质量又轉化为数量。从数量来說是多，从時間来說是快，从质量来說是好，从获得这些成就的劳动消耗来說是省。如果不讲究經濟核算，浪費了大量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从局部来看，或許可以多一点，快一点，从整个国民經济来看，决不能达到多和快的目的。所以，只有做好經濟核算，才能全面地貫徹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針，增加社会主义积累，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

經濟核算又必須在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指导下进行。要从整体出发，而不能仅仅从局部出发，局部的利益必須服从整体的利益。任何一个企业的經濟核算，都必須在国家計劃的指导下进行。經濟核算同劳动時間（包括物化劳动）在各生产部門之間合理分配是分不开的。国民經济各部門的有計劃、按比例发展，是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全国

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极其重要的保证。如果国民經济的比例失調，就会使一部分劳动力和机器設備暂时不能充分發揮作用，因而造成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巨大浪費。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須通过复杂的計算，来研究国民經济各方面的綜合平衡。国家有計劃地組織各地区、各部門、各企业的分工协作，是提高劳动的經濟效果的极重要的保证。国家在制訂建設計劃的时候，首先，要研究投資在各經濟部門、各地区之間的适当分配，保证各部門之間合理的比例关系；其次，要研究如何使每一項投資都發揮最大的經濟效果，以保证国民經济的高速度发展。

为着动員全体人民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除生产力的合理安排以外，还需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合理地調整生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发揚劳动人民高度的积极性和創造性，保证国民經济高速度地发展。单纯注意生产力的合理安排，而不注意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从这些方面来調动全体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創造性，显然也是十分錯誤的。社会主义的經濟核算也不應該离开广大职工群众，单纯依靠少数专职人員来冷冷清清地进行；而应当实行群众路綫，把专业經濟核算和群众性的經濟核算結合起来，在专职人員的指导下，动員广大职工来参加經濟核算，使每个人都关心自己劳动的成果，并利用核算的結果来进行評比，进一步調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創造性。只有这样，才能够在經濟核算中充分發揮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收到更好的效果。



美帝国主义在南越加紧进行军事干涉

郭 济 洲

最近期間，美帝国主义在南越日益加紧地进行军事干涉，严重地威胁着印度支那和亚洲的和平。这一事实再一次揭穿了肯尼迪政府所有关于“探求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言論，只不过是騙人的鬼話。

肯尼迪政府为了掩盖它在南越的新的军事冒险，捏造了“南越遭到北越侵略”的謊言，叫囂决心要“保护”南越的“安全”、“自由”和“独立”。这完全是混淆是非，顛倒黑白。

从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結束以来，美帝国主义就对南越步步加紧地进行侵略和干涉。那次日内瓦会议刚刚結束，美帝国主义就迫不及待地撕毁了日内瓦协议，拼凑东南亚侵略集团，公然把南越置于它的所謂“保护”之下。日内瓦协议曾經庄严地规定，越南南北双方当局通过协商，在一九五六年七月举行全国选举，以实现越南的和平統一。但是，美帝国主义却破坏日内瓦协议的这种规定，擅自在一九五五年十月把吳庭艳封为南越的什么“总统”兼“总理”。七年来，美国向南越非法运进了大批軍用物资，在南越新建和扩建了五十多个軍用机场和十多个軍港，派进了几千名軍事顧問人員。美国在南越的軍事顧問团，控制了南越軍事、政治、

經濟各方面的大权，实际上是吳庭艳傀儡政府的太上皇。事实很明显，美帝国主义对南越的所謂“保护”，就是把南越变为它的殖民地和軍事基地。

在美帝国主义的刺刀“保护”下，吳庭艳集团实行了野蛮的法西斯統治，疯狂地屠杀南越人民，灭絕人性的集体屠杀事件不断发生。七年来，南越人民被杀害了七万多人，被逮捕和拷打的达五十多万人，目前被监禁的仍达二十多万人。南越人民完全丧失了安全和自由。連南越伪国会的一个議員也不得不承认：“在我們同乡村人民接触的时候，我們看到無論在哪里，似乎良民的唯一願望就是怎样避免被捕和坐牢”。

事实无可辯駁地表明，美帝国主义对南越的侵略，加深了南越人民的灾难，使南越人民丧失了安全、自由和独立。而对着美帝国主义和吳庭艳集团的血腥統治，南越人民唯一的出路就是站立起来，为保卫自己的生存权利而进行斗争。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最近的一个文件說：“我們南越人民过去几年一直要求美吳集团放棄他們的法西斯政策，但是他們用枪炮和断头台回答我們的要求。因此，我們不得不用刀、鋤头和从美吳軍隊



繳获来的武器进行自卫。”南越人民的这种斗争，完全是正义的。越南全体人民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对南越的侵略和干涉，为维护日内瓦协议，争取越南的和平统一而进行斗争，这也完全是正义的。肯尼迪政府为了掩盖它进一步侵略南越的阴谋活动，反过来污蔑别人，叫喊什么“南越遭到北越侵略”，只能暴露出它自己极端无耻和狡诈的丑态。柬埔寨《潘查希拉》报曾经指出：美帝国主义“想把越南南方变成它在东南亚的巨型军事基地，变成监视柬埔寨和老挝的宪兵营。它捏造所谓‘共产党’侵入越南南方，但事实上没有什么共产党侵入越南南方，而只有越南南方人民起来反对吴庭艳的法西斯独裁制度”。

美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地要消灭南越的爱国民主力量，特别是南越人民的自卫武装。肯尼迪政府上台后，加紧了对南越的侵略和干涉的步伐。今年五月间，美国副总统约翰逊到南越同吴庭艳集团制定了全面加强干涉和控制南越的“八点措施”。从五月到现在，美国接连派遣了三十多个代表团，其中绝大多数是军事代表团，非法进入南越进行阴谋活动，并且制定了一个妄图在十八个月内消灭南越人民爱国正义斗争的“斯特利计划”。但是，美吴集团越是疯狂地镇压，南越人民的抵抗就越强烈，斗争就越发展。现在，南越人民参加斗争的越来越广泛，甚至吴庭艳傀儡政府的许多公务人员、伪军士兵和他们的家属也参加了斗争。南越人民的群众性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美吴集团的战争阴谋。

许多年来，美帝国主义一直在亚洲策划建立一个从南朝鲜经过日本、琉球、冲绳、台湾、菲律宾到印度支那的军事基地网，以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并镇压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美国故国务卿杜勒斯就曾经供称：“从战略观点来看，美国在(远东)这一地区的利益与所谓沿岸岛屿链锁是非常紧密地联系着的。这个沿岸岛屿链锁实质上有两个大陆基地。在北部为大陆的朝鲜，在南部，如我们所希望的，是印度支那。”在美帝国主义看来，南越在它的远东战略部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正因为这样，七年来，美帝国主义在南越投下了巨大的赌注，越来越加紧地把南越置于它的控制之下。但是，形势的发展正在走向美帝国主义愿望的反面。美帝国主义对老挝的侵略和干涉遭到了严重的挫败，美吴集团的反动统治遭到南越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其他傀儡政权也越来越不巩固。肯尼迪政府为了保持它在东南亚的侵略阵地，就更加加紧对南越进行军事干涉，以图压住阵脚。

肯尼迪政府加强对南越的军事干涉的主要手段，是进行所谓“反游击战”。肯尼迪上台不久，就派遣了大批所谓“游击战专家”非法进入南越。最近又增派了近四百名这种“专家”。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吹嘘说，这些“专家”都是从美国陆军的“特种部队”中挑选出来的，他们“受过最好的训练”，是“丛林战士的精华”。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在肯尼迪政府的战争计划中，“南越是美国陆军游击战术的试验场地”。这家报



紙还說：“肯尼迪还研究了中国共产党領袖毛澤东的著作，特别是关于游击战部分”。看来，肯尼迪政府很想从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經驗中寻找一些什么，用来对付人民的革命战争。这只能是枉費心机。游击战是革命的人民为了战胜暂时强大的敌人而使用的一种武装斗争形式，它是在革命的人民中产生并且是以人民的广泛支持为基础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尽管可能学到一些进行游击战的技术，但是由于他們同人民之間有着根本的利害冲突，因而也就无法真正掌握游击战这一战争形式。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蔣介石为了寻找镇压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方法，曾經精心研究过中国人民革命武装的战略战术，但是，并没有能够挽救他們失败的命运。今年六月在老撾的帕东地区，美帝国主义进行了一次“游击战”的試驗，結果以失敗而告終。在南越这个“試驗場地”的情况也并不妙。美国《时代》周刊承认，南越人民爱国武装“在乡村中赢得了普遍支持”，而这一点恰恰是經過所謂“反游击战”訓練的吳庭艳军队“所面对的一个重大不利条件”。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并不是完全没有看到他們的这种不利条件，但是，他們又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他們采取什么“稠密区”、“战略邑”等一类变相集中营的办法，把他們认为难以控制的地区的农民强迫集中到指定的地点，用铁丝网包围起来，妄图这样来割断南越爱国武装同广大人民的联系。美吳集团搞“稠密区”、“战略邑”这一套，恰恰暴露了他們无法得到南越人民支持的致命弱点。越南《人民报》正确

指出：“美吳集团决不能通过铁丝网、崗哨、枪彈来取得民心，决不能通过‘战略邑’来依靠人民，斯特利计划决不能巩固一个从根本上动摇的統治制度”，这样的计划“只能激起人民的更大的愤怒，导致美吳集团的法西斯制度的彻底垮台”。事实上，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于他們进行“反游击战”的前途是颇为悲观的。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西方和越南（指南越）的軍事当局一致认为，要消除游击队的威胁还需要許几个月，也許需要好几年。他們一致說，单靠軍事手段不能完成这项任务”。合众国际社报道，一个在“反游击战”中被打伤了的美国軍官干脆說，他不相信吳庭艳集团的军队能够消灭南越人民武装。

为了在南越扩大軍事冒险，美帝国主义还阴谋利用亚洲的一些仆从出兵干涉南越。据南越一家报纸透露，东南亚条约組織总部曾举行秘密会议，“同意派兵到老撾和南越”。《西貢晨报》援引华盛顿权威人士的話說，这些部队将由前侵略美軍第八軍軍长范佛里特指揮。許多迹象表明，美国还企图使用日本和蔣介石集团的军队干涉南越。美帝国主义认为，用这种借刀杀人的手法，可以坐收漁翁之利，而且可以使他們避免“成为民族主义仇恨的目标”。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用非洲人打非洲人，用拉丁美洲人打拉丁美洲人，是美帝国主义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一貫手法。現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越来越清楚地識破了它的这种詭計。美帝国主义企图利用亚洲的仆从来干涉南越，只能激起亚



洲人民更大的义愤和反对。

值得注意的是，美帝国主义已经把对南越的侵略和干涉推进到一个更加危险的阶段。最近，肯尼迪把他的特别军事顾问、“有限战争”的积极鼓吹者泰勒派往南越，研究了进一步控制和干涉南越的办法。紧接着，美国就把二百多名官兵、许多战斗机、轰炸机和直升飞机组成的空军部队派到南越。据合众国际社透露，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决定

派美国的军事人员深入到吴庭艳傀儡军的各级，一直到战场上的巡逻队；“如果这些措施不能扭转潮流，美国就将考虑由美国进行更加剧烈的干涉，包括空中和地面部队采取作战行动在内”。越南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正在对南越人民发动一场实际的战争。

美帝国主义在南越的军事冒险活动，是它全面制造国际紧张局势、推行侵略政策和

杀气腾腾的“和平爱好者”

·袁先祿·

肯尼迪选择了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日——这个叫做“和平节”的日子发表了一篇讲话，谈论“和平”问题。但是，从这个讲话里，人们听到的不是什么和平的声音，而是一种杀气腾腾的战争叫嚣。

“不付出代价、不承担义务、不冒险，就没有办法维护自由的边疆。在我们这一代，没有通向和平的捷径。”肯尼迪在讲话中这样叫嚷。那末，要付出什么代价和冒什么险呢？他接着回答道：“归根结蒂，维护和平的唯一办法是要准备最后为我们国家而战——并且说到做到。”

肯尼迪上台以后，一贯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道地的“和平爱好者”，甚至连他疯狂地扩军备战也說成是出于对“和平”的热爱。他在

军事预算特别咨文里說：“我们的军备的首要目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是为了确保永远不必加以使用，是要防止一切战争，不管是全面的还是有限的，核的还是常规的，大的还是小的”。肯尼迪在“和平节”的“和平讲话”中，不再宣传什么“确保（军备）永远不必加以使用”和“要防止一切战争”之类的鬼话了，但他却仍然披着“维护和平”的破旧画皮。

打着“维护和平”的幌子发动战争，这对于美国统治集团来说，是早有先例的。例如，在一九五〇年八月，美帝国主义向朝鲜伸出侵略的黑手以后不久，杜鲁门政府的海军部长马休斯就这样宣布：“为了取得世界和平，我们应该愿意付出制造战争的代价。”他甚至表示，这样“会给我们赢得一个值得骄傲的和



战争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帝国主义更加疯狂地发出战争叫嚣。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叫嚷要为了“维护自由的边疆”而“付出代价”和“冒险”。美帝国主义正在世界各地采取一系列挑衅性的军事步骤。它在积极扩大对南越的武装干涉的同时，不断地在西柏林进行军事挑衅，并且准备重新燃起老撾的战火和准备对古巴发动新的武装入侵。肯尼迪政府上台以来，尽管发

出了各种各样的“探求和平”的谎言，但是人们清楚地看出，它一直在变本加厉地扩军备战，顽固地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亚洲各国和全世界各国人民正密切注视着美帝国主义在南越和其他地区的新的军事冒险。中国人民坚决同越南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站在一起。我们坚信，经过坚持不懈的斗争，一定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保卫住印度支那和世界的和平。

众望所归的称号——我们将成为第一个为和平而战的侵略者”。

马休斯之所以公然把侵略者的称号渲染得那么动人，这完全是出于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就在同一年的四月里，美国统治集团的一个忠实的传声筒、《幸福》杂志的出版人杰克逊在鼓吹美国必须首先发动战争的时候解释道：“在我们生存的世界上，胜利的军事行动将是最能得到普遍谅解的以和平为目的的挑衅行为。”当时，美帝国主义固执地认为它的武装力量是天下无敌的，可以轻而易举地以征服者的姿态来践踏整个朝鲜并且闖进中国。麦克阿瑟就曾经提出保证：朝鲜战争最多不过是一次几个月就能结束的“警察行动”。而杜鲁门对这种狂想则称赞说：“麦克阿瑟的韬略在历史上也罕见其匹……做得好，做得高尚。”毫无疑问，在美国统治集团看来，实现这种侵略梦想是“值得骄傲”的，而且还会在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小伙伴中间得到“众望所归”的“信誉”。

然而，为时不久，历史就给美国侵略者

做出了结论。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使侵略者碰得头破血流，最后终于迫使美帝国主义接受了停战。事实证明，人民比帝国主义者更有力量。美国侵略者的结局，显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一九五四年七月三十日伤心地写道：“接受朝鲜停战的时局演变是不愉快的，这种发展标志出美国武装从一八一二年以来第一次没有能够赢得胜利”。他们也没有赢得什么“众望所归”；恰恰相反，当时在西方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出现了一片对美国的讥讽。

在朝鲜战争中美帝国主义更加清楚地暴露了它的纸老虎的原形。在这以后又怎样呢？看一下华尔街著名的策士李普曼的描述吧！他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苦恼地写道：“曾经一度对我们有利的不平衡状况一直在改变着。而在朝鲜战争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一九五七年前后，我们在世界上的相对军事和经济力量剧烈地下降了。”情况的确如此。一九五七年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东风进一步压倒了西风。连



肯尼迪自己也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他在一九五八年八月的一次演说中，就为美国军事力量大大落后于苏联、美国对苏联“存在着导弹差距”而叹息，并且提出美国应该“调整政策”，采取一种“败狗战略”，“来赢得重新取得优势所必需的时间和机会”。从那时到现在，美国显然并没有能够“重新取得优势”。肯尼迪在上台以后，就不止一次地惊呼“时间对我们不是有利的”。他在最近的一次演说里，还对美国面临着“这么多和这么困难的挑战”表示忡忡不安。

尽管如此，肯尼迪却还是步着马休斯之流的后尘，叫嚣什么为了“维护自由的边疆”，准备“付出代价”，准备“冒险”。当然，有一点不同的是，今天世界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认识得更清楚了，他们保卫和平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并且也越来越懂得如何对付他们的这个头号敌人了。因此，肯尼迪在他的战争叫嚣中，就不敢再像当年的马休斯那样夸耀侵略者的称号是“值得骄傲的”，而是做贼心虚地供认发动战争对美国说来是一种“冒险”；但是，他仍然叫嚷要制造战争，并且表示要“说到做到”。你看：在南越上空，美国轰炸机带着惨厉的啸声飞行着；在老撾战场上，美国的大炮等待着重新点燃起引线；在加勒比海地区，美国正准备对古巴发动新的武装干涉；在西柏林，美国的武装部队不断地进行挑衅活动；在全世界很多地区，美国正在频繁地调兵遣将，并且剑拔弩张地举行一系列的军事演习。不但如此，美国统治集团还毫不掩饰地表示，他们对于发

动一场全面的核战争并不是没有考虑的。华盛顿那帮喝血的狂人们所演奏的战争交响曲，正在发出越来越刺耳的声浪。

肯尼迪之流企图用这一切来吓倒爱好和平的人民，只能是徒劳而已。朝鲜战争已经证明，在人民的斗争面前，侵略者只能得到可耻的结局。在东风更加压倒西风的今天，美帝国主义如果胆敢发动新的侵略战争，下场如何是不难想见的。但是，肯尼迪在“和平节”的“和平讲话”，倒也从反面揭示出这样一个真理：尽管美国统治集团竭力装出一副“和平爱好者”的姿态，但是他们嗜战如命的帝国主义本性，是至死也不会改变的。在他们自以为有把握进行“胜利的军事行动”的年代里，人们固然应该狠狠地对他们的战争冒险进行反击；即使在他们承认处境不利而被迫采取所谓“败狗战略”的今天，人们也决不能一丝一毫放松警惕。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只有不断揭穿美帝国主义所谓“爱好和平”的虚伪性，并且更加团结起来，同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活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真正赢得世界人民所需要的和平。

更 正

本刊一九六一年第二十一、二十二期第十页右栏第十八行“曲歪”应为“歪曲”；第二十八页左栏倒数第三行“宁夏省”应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三十九页右栏第六行“查尔·戴维斯”应为“查尔斯·戴维斯”；第四十二页左栏第十七行“爱华德·泰勒”应为“爱德华·泰勒”。



总 結 和 預 見

· 卞 征 ·

預見性是做好工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在工作中有預見性，就能取得主动，比較順利地达到預期的目的。諸葛亮这个历史人物，在民間傳說中被认为是智慧的化身，他聪明、有預見、善于計算。我們也要学会預見的本領，要能够看清事情发展的方向，善于給事变趋势描画出一个輪廓，規定正确的方針和长远的計劃。这是为革命工作、特别是为革命的战略指导所必需的。

馬克思主义者的特点之一，正在于有科学的預見性。毛澤东同志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們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規律，他們懂得辩证法，他們看得远些。”^①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馬克思主义者就能够大体上預見客观现实的发展行程，在斗争中做到全局在胸，并规划出若干工作步驟，而避免那种缺乏方向的、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沒有这种科学的預見的本領，就不可能在工作中規定正确的路綫、方針、政策、工作計劃等等。

为什么人們能够有科学的預見呢？当然，科学預見的本領不是什么天賦的才能，人們也不是“掐指一算”就能推断将来。人們要能够科学地預見将来，首先就要能够科学地認識过去。如果对于已經发生的事情，已經做过的工作，不能深刻地、正确地理解，那么，人們对于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还没有做的工作，就不可能有什么預見。

了解已經发生的事情，看起来好像并不困难。有一种人只是表面地肤淺地看到眼前所已經出現的这种那种現

象，就匆促地作出判断，自以为对于客观事实已經洞若观火。他們的本領只是追随着已經出現了的一点两点現象而指手划脚地发表自以为高明的議論。人們常嘲笑这种人是“事后諸葛亮”。这种人是应该受到嘲笑的，因为他們自以为很聪明，但实际上他們并不真正了解已經发生的事情，当然也不可能有預見将来的任何本領。

要真正了解已經发生的事情和已經做过的工作，常常是要下一番苦功的。需要从复杂多样的現象中看出它們之間的联系，需要在它們中区别真象和假象，区别主要現象和次要現象，需要捉住发展过程中的本质的东西，求得对发展过程的規律性的認識。对于已經做过的工作，要真正懂得成功的为什么成功，失败的为什么失败。这样，才是对于过去的事情和工作做出了科学的总结。

有人否认事物发展的客观規律，从而认为人們只能認識已发生的事情，不能对将来有所預見。我們是反对这种观点的。我們认为，事物的規律性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能够被認識的。我們能够認識已发生的事情，也能够預見将来。总结过去，預見将来，这两件事是密切关联的。沒有对过去的科学的总结，也不会有对将来的科学的預見。馬克思主义者依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依靠实事求是地进行調查研究的作风，能够科学地总结过去，从已經发生的事情中得到規律性的認識，并且运用这

^① 《論人民民主专政》。《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3頁。



种规律性的認識来推断客观现实的今后发展形势，指导我們今后的实践。

那种自以为是諸葛亮但实际上对已經发生的事情也只是一知半解的人，当然只会受到人們的嘲笑。我們必須切切实实地研究已經发生的事情，認真地做事后的諸葛亮，因为只有做好了事后諸葛亮，才有可能做事前的諸葛亮。

在做了事前的諸葛亮之后，也还必须做事后的諸葛亮。这就是說，在有了科学的預見之后，并在这种預見的指导下进行工作的过程中，也还必须时时总结工作。这是因为，我們能够有科学的預見，并不等于說，我們能够事先确切知道发展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形。客观现实的行程是異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客观事变的发展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需要有个过程。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事前或事变刚刚在我們眼前展开的时候就洞察其中一切细节，不可能在某种具体事物还没有經過一定实践的时候就預先認識其特殊的規律。人們必須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对原定的計劃、方案进行修正、补充和发展。当前运动的具体情形和其特殊規律，新出現的或大或小的問題，以及解决这些問題的具体形式和方法，只有在实践过程中，經驗才能給我們指示出来。为了不断地取得胜利，必須不断地分析和总结实践經驗。

馬克思主义者的聪明，不在于自认为能够在事先絕對确切地估計到一切（这是无法做到的），而在于能够坚信群众的历史創造性，能够在实践中及时察觉和捕捉住新的問題，或者在实践告一段落时及时总结出新的經驗，以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实践。

列宁曾經說过，馬克思主义“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識闡明的經驗总结”^①。他在談到馬克思的国家学說时曾指出，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經指出了无产阶级組織成为統治阶级的历史总方向，但是，“无产阶级組織成为統治阶级究竟会采取怎样的具体形式，怎

样才能組織得同最完备最彻底的‘民主’相适应，关于这个問題，馬克思并没有陷于空想，而是期待群众运动的經驗来解答”^②。

列宁說：“这个任务（指破坏和消灭旧的国家机器的任务——引者注）的提出，不是由于邏輯的推論，而是由于实际的事变发展，由于一八四八——一八五一年的生动經驗。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还没有具体提出用什么东西去代替这个必須消灭的国家机器的問題，从这里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是怎样严格地依据实际的历史經驗的。那时在这个問題上，經驗还没有提供材料，后来在一八七一年，历史才把这个問題提到日程上来。”^③

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以后，馬克思终于从公社的經驗中，找到了公社式的中央集权的新的国家机器，以代替必須打碎的旧国家机器。列宁贊揚馬克思說：“他吸取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实际經驗，竭力从这个經驗中取得实际教訓。他向公社‘学习’，正像一切偉大的革命思想家不怕向被压迫阶级的偉大运动的經驗学习一样，他对于这个运动从来没有讲过一句学究式的‘訓言’（像普列汉諾夫所說的‘本来是不需要拿起武器的’，或策烈铁里所說的‘阶级应当自己約束自己’）。”^④

列宁在括弧里提到普列汉諾夫，是指普列汉諾夫在被称作“总演习”的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后，抱怨当时参加革命的群众不該拿起武器，不該作冲击反动統治的尝试。列宁斥責道：这不过是“麻木不仁的迂腐說法”，是“自鳴得意的庸人的說教”。像馬克思热情地贊揚巴黎工人冲天的尝试，并从其中总结出公社的偉大历史經驗一样，列宁同样热情地贊揚俄国工人一九〇五年的英勇尝试，并从其中总结出了苏维埃組織形式这一偉大历史經驗。

①②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4、404—405頁。

③④ 同上书，第396、412頁。



大家知道，馬克思对于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經驗的总结，轉过来就成了偉大的科学預言。粉碎资产阶级专政的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国家机器这个思想，現在已經在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成为事实。

人民群众是創造新生活、新历史的偉大力量。认真分析和总结实践經驗，就是一个正确对待群众的历史創造性的問題。“三个牛皮匠，合成一个諸葛亮。”群众才是真正有本領的。只有重視广大群众創造历史的各种英勇尝试，善于把他們的丰富实践經驗集中起来，我們才会有无比的智慧，才能增強科学預見性。我們党的路綫、方針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想出来的，而是在群众的偉大斗争中、在实际經驗中产生的。我們为实现路綫和方針所必要的各项具体政策和具体办法，也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而是在总结群众实践經驗中逐步地发展起来和完备起来的。

在党的既定路綫、方針、政策指导下，我們从事日常工作，也必須有这种自觉，必須充分重視群众的实践經驗。党的路綫、方針、政策給我們指示了方向、道路和哪些事情应当做、哪些事情不应当做，但还需要我們估計具体条件，預見执行中的問題，在执行中及时总结經驗。許多事情做得正确，除了由于有党的正确政策和正确领导，我們在工作中执行了这些政策，还由于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創造，我們在工作中依靠了群众的力量。总结經驗，就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方法的指导下，在党的路綫、方針的指导下，对于执行中提供的經驗事实和群众的創造做仔細的分析，檢查我們所做的一切，探索新的問題和新的办法，弄清楚什么是我們执行中应当发揚和推广的，什么

是应当补充和校正的。通过这种途径，使我們的認識不断得到提高，使我們的各项具体政策和具体办法不断得到发展。

特別在实际生活經過重大变革以后，千百万群众和广大干部在实践中取得了空前丰富的經驗，碰到了許多新的极其重要的問題，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有一段时期，使广大的干部和群众很好地消化这些經驗，分析这些問題，以便更好地領会和执行党的方針、政策。总结我們已有的丰富經驗，这也就是最实际地最有效地訓練干部和教育群众。我們向群众学习，集中、总结了群众的經驗，还只是事情的一半，我們这样做的目的，还是为了使这种經驗为广大群众自己所理解和掌握。只有当集中了的經驗不仅是领导者的經驗而且是广大群众共同經驗的时候，只有当某一事物的規律性不仅为少数领导者所認識而且同时为广大群众所認識的时候，只有当根据这种經驗和規律所制定的各项政策和办法，不仅为领导者所自觉掌握而且为广大群众所自觉掌握的时候，我們才有可能在今后的实践中获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毛澤东同志认为：在战略上，我們必須明确指示方向，估計前途，掌握全局，而避免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但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們又必須走一步就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分析和总结其具体經驗，据以檢驗和发展已有的战略估計和战略布置^①。所以，可以說，我們既要做事前的諸葛亮，又要做事后的諸葛亮。把这两者統一起来，才是我們的正确态度。

^① 参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16頁。



学 习 常 谈

謝 觉 哉

听熟了的没有新内容的谈话，常被讥为“老生常谈”。其实，既有人谈且有人常谈，必然有常谈的客观需要。尽管讲过千万遍，时间经过不知好久了，但事实仍然存在，仍需要谈。谈，也不止是复述，常常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赋予了新的意义。“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理自知”，书虽是旧的，理却是新的，因为读的人前进了。学习也是这样。作学习常谈。

路是人走出来的。开始只知道要这样走，后来选择走过的路线，加以修建、接济，遂成为四通八达的康庄大道。学习的方法同样也是人“走”出来的。好的方法，有的经过千百次的考验，把它肯定下来，永久有用。比如“学习”二字，是从孔子“学而时习之”的话来的。学了要时时练习，“工多出巧艺”，不可随学随忘。把学与问总结为“学问”二字的名词，更是精辟。要学更要问。学可能是人来教你才学，问则出自内心的要求，比学还重要。又如“学以致用”，用学的“矢”，射用的“的”。不为着用，学做什么？这些话过去要谈，现在还要谈，因为有的人学了不习，“左边耳朵进，右边耳朵出”。有的人自以为是，不肯问人，更不肯下问，因而常常是一知半解，不懂装懂。有的人把学习当镀金：从不想到用；镀金近不得火，近火就露出了无用的原形。当然，现在谈这些是很不够的，再加上“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理论和实践统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等等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些指示，我们耳熟了，但不一定把握得住。某时把握住了，某件事把握住了，换一个

时间，换一件事又可能把握不住。学的法没有上身。因而时常要把这些教训来鞭策自己。

学习的方法和内容是相互为用的，新的内容需要有新的方法。搞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经过了許多曲折、艰难，才得到成功。在六亿五千万人的国度里搞社会主义建设，其伟大繁复比以前的革命要甚过若干倍。因而我们要顽强地学，要仔细地学。既要高瞻远瞩，又要心灵手巧。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不忽视一点点好的或坏的经验，好的一定推广，坏的一定戒绝。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大路，人民群众喜欢的路；但有的路基还筑得不坚实，走十轮大卡车还不够顺利，有的干部还不善于掌握新的形势，看出和解决新的问题。这就要求更加注意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相结合。

总的学习方法是有了，还要拿许多新的事实和新的经验来加以充实，使学到的就可以用并用之有效。

延安中央党校前门壁上嵌着毛泽东同志写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他把二千年前《汉书》作者称赞河间献王的这四个字，移作我们党校的校训，并且赋予了完全新的解释。不论工农商学兵哪个行当，不论空中、地上、中央、地方哪项建设甚至个人的生活处理，没有可以不知道具体情况或者不按具体情况进行安排而弄得好的。然而不知道或不按照这起码规律做事的人却常常有。所以，“实事求是”这四个字，任何时候都需要反复地提出。

调查研究是一种学问。调查是弄清事实，研究是在事实里面找出规律，找出恰当的办法。走马看花比不走马的



好，但印象总是模糊；下馬看花比走馬好，但也不一定看得真實。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要“眼睛向下”，要“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否則“先生”就不理你，“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其次，要講究調查的方法，如“開調查會”，“自己當記錄”；要“有計劃地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這樣，所得的才是“實事”，至少也是近于“實事”。然後才有“發言權”，能在这“實事”上去“求是”。

調查要“求是”，不可道聽途說；把可靠的調查材料加以分析研究，定出辦法，是進一步的“求是”。這就是毛澤東同志說的：“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①

作客觀的周密的調查，是第一步；有了周密的調查、加以分析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是第二步；然後到群眾中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是第三步；然後同群眾一起堅持下去並在群眾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是第四步。然後再從群眾中來再到群眾中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②我們這樣做了沒有？這樣做了，一定成績顯著；沒有這樣做，一定損害韶華。

“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的這一條，非常重要，如果不僅沒有這樣做，甚至連這一條都忘記了，那就應該痛自改悔，在大腦皮層上深深地刻畫一下。

三

《禮記》上說：“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應該是做然後知困，教也是屬於做的一種。徒弟學技術、學理論，碰到困難，總是去問師父，師父沒有不歡迎徒弟這樣地問的。因為他已到了難解難分的時候，靠近了關，闖不

進去，或者闖進去了，不得出來。這時候一經指點，就豁然貫通。師父呢，“師逸而功倍”（《禮記·學記》）；徒弟呢，“聞一以知十”（《論語·公冶長》）。

孔子很重視這個道理，他說“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論語·述而》）。心憤憤，急要說而說不清楚，這是前進的徵兆，是易于啓發的時候。這種徵兆，任何人都曾有過，也任何時候都有。如果說，利害切身的事能憤悱，不是切身（實際是最大的切身）的却不憤悱；如果說，小孩子能憤悱，年歲大了反而不憤悱；如果說，學技藝、啃課本能憤悱，身負“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反而不憤悱，這在理上說不過去。

有了憤悱就會促使我們更好地學習，至于啓發，則時刻在等待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黨中央的指示，是啓發的鑰匙；個人自學，同志們辯論，是啓發的場所。只要把問題提出來，個人的做法和看法，拿出和人家的做法看法對比，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與黨的指示對比，立時就可融會貫通，或者“一法通萬法通”。

不怕接受不到啓發，只怕自己不憤悱。

不憤悱的人是有的，在某一件事某一時間碰了釘子而不引起憤悱情緒也是有的。要向這種情緒開火，不開火，一定學不進去。

四

碰釘子，知道是釘子，碰一下就設法避開，不一定成錯誤。只有不知道是釘子或雖知道了而硬要碰，才會闖出禍來。但也不要緊，人總由犯錯誤走到不犯或少犯錯誤的。

常言道：“吃一虧，長一智”，吃多虧應該長多智，吃大虧應該長大智。然而，不少人吃了虧并不長智，因而還要繼續吃虧或繼續吃大虧。長一智的“長”字上有工夫。禾苗或樹苗在泥土里長出，下面生根，上面出千出枝，多

^① ^② 《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901頁。



費力！智的生长也是这样。首先要对錯誤进行调查，查清楚所犯錯誤的事实及因而受到損害的后果。不止显著的、人家举出了的后果要查清楚；連尚没有人指出的，但其影响所及成为不易补偿的损失也要查清楚。这里不可能有一絲馬虎，或采取避重就輕的态度。責人要寬、責己要严，这叫“自訟”——自己跟自己打官司。其次，不可推卸責任。錯誤总是有許多因素构成的，不要拿別人的差錯来掩盖自己。再其次，在学习时候不要以为錯誤不是自己做的或自己不是主要負責人，就可放松。要設想：假如是自己負責的話，有沒有把握可以不犯？可能同样要犯，甚至犯得更重。因此應該借他人之鏡来照自己之影。

这叫做虚心。把心里打扫干净，没有一点什么肮脏东西作反省的阻碍。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所以对于人要等待，让人慢慢去想，但对于自己，則不应以“等待”自恕。要急于找出錯誤的根源，因而得到纠正錯誤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这就是“长智”。脑子里装备了新的武装，以后就可以不犯或少犯錯誤。

“失败是成功之母”，錯誤是正确之母。犯一次錯誤学一次乖。学习就是学乖。

五

没工作过没学习过的人好像一張白紙，容易学，印上什么就是什么。但学的没有經過实践，印象总不会深刻，說时了了，用时茫然。工作过没学习过的人，可能一接触理論（理論是以前积累的經驗总结），如获至宝；积累的疙瘩解开了，信心增长了。但可能脑袋里装满了經驗，自以为是，不易接受所未經驗过的新的东西，因而限制了自己的发展。工作过学习过的人，他們的情况有几种。一种是正常的。学得不够，不能应付工作上的要求。做到老，学不了。新出的东西要学，学过的东西也要学。这样，才能“日知其所无”。第二种是学过的东西，没有用到工作上去，是学时没有了解，因而学了也等于未学。第三种是違反所学，教你走东，偏要走西；明明知道那里有釘子，偏要硬着头皮

去碰；不研究党的指示，不傾听群众的呼声。孔子說的“鳴鼓而攻之”，我們党說的“治病救人”，是指此种人。治的方法是“学”！包括第二种人在內，叫重新学习或重新教育。要像以前讀旧书一样，从“人之初，性本善”讀起。为什么？因为你沒有懂。試想想：将近三十年前毛泽东同志讲的“沒有调查就沒有发言权”，你懂了沒有？在延安的整風报告你懂了沒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关心群众生活”……你还記得沒有？更不要說《实践論》、《矛盾論》以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著作，更不要說党中央的許多重要指示。如果我們回答是懂了，沒有忘記，那为什么沒有或沒有完全体现到工作上来？應該回答是沒有懂，忘了。因此就要重新学习。

重新学习是要把自己看做小学生——的确也是小学生，而不要把自己看做是大学生。

重新学习并不是不好听的客詞。人生在世，总是千百次重习以前讲过的道理和做过的事实。从旧的东西中产生出新的，也可以从中知道我們的过失而加以弥补。

“痛悔”“痛改”，是学习中常用的字。誰都知道有过失要改，但自己犯了过失，总不願意改或不願极快地改，老話叫“憚改”，有点怕。怕什么？怕痛。比如人身上生了疮毒，要割治，受不住割治的痛，疮毒不会消失且将发展。重新学习，就是要人痛悔痛改。“长痛不如短痛”，自己向自己猛攻一下，割去疮毒，遍体清凉。改过——丢掉包袱，也是一样。常言說的“痛快”，从“痛”里换来的“快”，才是真“快”。每个人检查自己的过去，总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痛的經驗，大痛大快、小痛小快、不痛不快。认真学习的人，要重視这个“痛”字。

重新学习，没有人可以例外。尽管錯誤的事是个別，錯誤的人是少数，但也有些人沒有发现这个錯誤或发现了采取自由主义，不敢揭发，不敢斗争。归根到底，还是学习不到家。所以每个人都要抱同样的志願和勇气，认真地学习。把自己放在学习圈子外面，是不对的。



正确对待农村人民公社内部存在的经济差别

· 何予 ·

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内部的各个生产大队之间，生产大队内部的各个生产队之间，在经济上都存在着种种差别。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这种经济差别，特别是各生产队之间的经济差别，对于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保护和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经营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巩固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农村人民公社内部所存在的经济差别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并且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由于自然条件不同，技术装备程度不同，经营管理水平不同，造成了各个生产单位之间生产收益上的不同。生产条件较好、经营管理水平较高的生产单位，比生产条件较差、经营管理水平较低的生产单位，可以得到更多的生产收益。这种情况在生产大队之间也是存在的。但是，由于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现阶段还不是公社一级基本所有

制，还不在全社的范围内进行统一分配，所以解决各个生产单位之间收益分配的问题，主要不是在生产大队和生产大队之间，而是在生产大队内部的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在生产大队内部的各个生产队之间，合理地分配生产收益，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正确对待农村人民公社内部经济差别的核心问题。

在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内部，生产收益的增加，大体上有四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有一些生产队，在以往较长的时间中，甚至当它们还是劳动互助组或者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就开始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多种经营，积累资金，从多方面创造了良好的生产条件，因而逐步地获得了较高的生产收益，社员的生活也一天天地富裕起来。

另一种情况是，有一些生产队，原来的生产条件比较差，在公社化以后的几年中，发愤图强，兴建小型水利设施，修整梯田、坡地，改造低产田，实行精耕细作，因而各种农作物的产量逐年增加。在它们当中，有的由缺粮队变为余粮队，有的由“穷队”变为“富队”。

再一种情况是，有一些生产队，原来就拥有比较优越的自然条件，或者拥有特殊的自然资源，或者占有较好的地理位置。这些生产队，有的以经营经济作物为主；有的以经营粮食作物为主，同时从事多种经营，如经营果树、园艺、茶叶、蚕桑、畜牧、渔猎等，或者用当地特有的原料，如木、竹、草、苇、石等，进行手工业生产。在农业合作化以前，当地农民就有较高的生产收益，生活一向比



較富裕。

还有一种情况是，由大集体——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或者现在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运用集体力量，在所屬的全部生产队或者一部分生产队經營的土地上，进行較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設，改变了生产面貌；或者由大集体投放資金，使原来經營一般农作物的生产队扩大了經營范围；或者由大集体购买机器，安装电力設備，使全部或部分生产队采用机械或电力排灌；或者由大集体直接举办农副产品的加工业及其他副业生产；等等。这样，一方面，大集体自身拥有較多的生产資料和其他公共财产，并且有較丰厚的生产收益；另一方面，大集体所屬的全部或部分生产队，在大集体的帮助下，創造了良好的生产条件，显著地发展了生产，因而这些生产队社員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从以上各种不同的情况可以看出，更多的生产收益的形成主要是当地社員多年辛勤劳动的結果。在許多地方，正是經過人們的辛勤劳动，才把不利的自然条件改造成有利的自然条件，把原来沒有开发、利用的自然資源，开发、利用起来。在这种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們往往要經過反复的試驗，甚至要遭受多次的失败，付出較多的代价，才能逐步地取得日益增多的生产收益。当然，自然条件的好坏也是影响生产收益多少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在較多的場合下，自然条件与人們的辛勤劳动和經營管理，是难以截然分开的。自然条件即使很好，如果不經過人們的利用和改造，是不会自行为人們提供收益的。不适当地夸大自然条件的作用，实

质上等于否认人們辛勤劳动的作用，否认人們同自然作斗争的偉大意义。因此，在上述第一、二、三种情况下产生的更多的生产收益，归各該生产队所有，自行分配，是完全合理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这部分生产队在較长期間的发展中实际形成的收入水平和社員生活水平不致降低，才能激励这部分生产队繼續付出更多的劳动来努力发展生产，也才能发揚这部分生产队和其他单位联合起来发展集体經濟的积极性。至于在上述第四种情况下产生的更多的生产收益，应该基本上归生产大队所有，由生产大队实行統一分配。因为这部分生产收益的形成，是整个大集体共同努力、付出劳动、投入資金的結果。这正如俗語所說的：“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树底下有蔭涼”。由生产大队統一分配，就能使每个生产队都获得这种成果。当然，在生产大队統一分配时，也需要照顾到各个生产队之間的差别，使多劳的生产队多得、少劳的生产队少得，做到公平合理。

有的同志认为，既然生产大队是一个統一整体，不論在何种情况下，更多的生产收益应该全部归生产大队所有，由生产大队实行統一分配。至于对超額完成包产計劃的生产队，只要給予一定数量的奖励就可以了。

如果按照这种意見去做，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很明显，原来收益較高的生产队，就要降低收入，而原来收益較低的生产队，收入却要增多。对于降低了收入的生产队來說，既然不是他們生产的東西比以前少了，那末，他們就会感到“吃了亏”，干部和社員的生产积极性就会受到挫伤。反之，对于增高了收入的生产队來說，既然不是他們生产



的东西比以前多了，他們自然会感到是“沾了别人的光”。同时，干部和社員就可能誤认为不必努力发展生产也可以增加收入，因而不去积极改善生产經營。此外，对于各个生产队來說，还可能产生一种錯觉，认为由他們自己进一步发展生产而增加的生产收益，也将不屬于自己，因而不再积极从事农业基本建設和扩大再生产。从这里可以看出，对于各个生产单位原来存在的收益上的差别，如果不是采取发展生产、提低就高的方法使之逐步縮小，而是采取削高就低的分配方法使之取平，是有害无益的。

当然，我們說承认各个生产队之間的經濟差别，使更多的生产收益归那些生产条件較好、經營管理水平較高的生产队所有，并不是說不需要考虑到大集体以至国家的利益。公社和生产大队要按照一定的比例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国家要按照規定征收农业稅。在这里，获得更多生产收益的生产队，无疑地对国家、公社和生产大队做出了較多的貢獻。

二

自然条件在农业生产单位之間收益差額的形成上是一个重要因素。因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自然条件較好的生产队，在生产中，常常費工較少，而收益較多；自然条件較差的生产队，常常費工較多，而收益較少。如果把前者的更多的生产收益归本单位所有，那末，是否会发生多劳者少得、少劳者反而多得这种違反按劳分配原則的現象呢？

当然不会。我們知道，所謂按劳分配，是說在生产資料公有制的条件下，按照劳动

者在生产中所投入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分配消費品。

馬克思說：“消費品的任何一种分配，始終只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后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則表現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①简单地說，就是生产資料归誰所有，产品就要归誰分配。

現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在这两种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的情况就不完全一样。我們把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实行按劳分配的情况，对照地看一下，問題就更加清楚。

在全民所有制的同类的国营企业之間，无疑也存在着生产条件上的差别。例如，在铁矿采掘工业中有富矿和貧矿的差别；在鋼铁基本建設工程中有优良場地和不良場地的差别；在同类鋼铁企业之間有生产設備和交通运输条件等方面的差别。这种生产条件上的差别，影响着同类企业之間的劳动生产率。生产条件較好的企业，成本較低，收益較多；反之，生产条件較差的企业，成本較高，收益較少。但是，由于生产資料屬于全民所有，不論同类各企业的生产收益的差别有多大，其产品都屬于全民所有，并由代表全民的国家对劳动者实行統一的按劳分配。这就是在現代化的同类国营企业中，不論各个企业的生产收益是多是少，职工的工資水平和福利待遇，却可以大体上一致的基本原因。当然，就是在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內，国家直接經

^① 《哥达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5年版，第23頁。



营的现代化大企业和地方经营的中、小企业之间，以及不同部门的企业之间，职工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也是各有差别的。

在集体所有制的条件下，情况就不一样了。在那里，生产资料属于集体所有，产品也属于集体所有，收益分配当然也只能在各个集体的范围内进行。我国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是三级集体所有制，实行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制。这样，分配的结果，就不能不表现为自然条件较好、费工较少、经营管理水平较高的生产队，收益较多；自然条件较差、费工较多、经营管理水平较低的生产队，收益较少。同时，收益较多的生产队的社员，依据按劳分配所得的收入一般较多；收益较少的生产队的社员，所得的收入一般较少。在生产大队内部各生产队之间以及各生产队的社员之间这种收入水平上的差别，在集体所有制存在的情况下，是必然会产生。因为我们不能超出集体所有制的范围来实行像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那样的按劳分配。

在我国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中，实行三级所有，三级核算，承认和照顾各生产单位之间，即生产大队和生产大队之间、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生产收益上的差别，是完全适合我国当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群众的觉悟程度的。我国当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基本上靠手工操作，新式农业机器虽然不断增多，但是还远不能满足广

大农村的需要。这种情况就决定了生产单位的规模不宜过大。农村人民公社的直接生产单位——生产队的前身，一般是原来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个体农民在参加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开始把他们的生产资料转归小集体所有。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成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后转入人民公社的时候，生产资料又由小集体所有转归大集体所有。这些生产资料，包括土地、耕畜和农具，仍然长期固定地为小集体生产队使用，甚至保留一部分为它们所有。这些情况决定着我国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在大多数情况下，在较小集体的范围内进行按劳分配是较为适宜的。只有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大大发展，以及随着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所有制的发展，我们才能进一步改变这种分配关系。

三

那末，这样一来，各生产单位之间在生产收益上的差别是不是会日益扩大起来呢？

农业合作化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农村经济发展情况证明，并不都是这样的。许多在今天看来比较富裕的生产单位，正是那些原来生产条件不好，农民生活贫困，因而被人称为“穷棒子社”、“穷窝子村”或“穷山沟”等等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农民是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经过艰苦奋斗，



才翻身致富的。在我国农村里，这种由穷变富的生动事例，几乎随处可以看到。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五年谈到王国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曾经这样说道：“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①农业合作化以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方向的正确。

在这里，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在于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这就是：承认差别，照顾差别，用发展生产的方法去逐步地缩小差别，引导广大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把农民群众的集体生产积极性充分发扬起来。许多在今天还比较困难的生产单位，在国家和人民公社的大力支持之下，经过它们的努力，由穷变富的过程，将不是很慢，而会像王国藩农业生产合作社那样，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改变面貌。实际工作中的经验表明，人们愈是认真地承认和照顾农村中客观存在着的经济差别，愈是认真地采用发展生产的方法去缩小这种经济差别，特别是采取有效办法帮助穷队赶上富

队，差别愈将逐步地发生变化，广大农民共同富裕的愿望，愈将逐步地得到实现。如果忽视这种客观存在着的经济差别，或者采取不适当的办法例如恩赐的办法企图去“消灭”这种经济差别，那末，差别就不仅不能“消灭”，反而将为广大农民的集体生产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消极作用，为自己的工作造成困难。

在社会主义的集体农业中，存在先进与落后的差别，是事物发展的正常现象。在每一个大集体中，有一定数量的先进的生产单位，不仅可以使干部取得领导集体生产的经验，并且可以为其他单位树立前进的榜样。我们应当在各生产单位之间经常组织革命竞赛，并且按照等价交换、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互助协作，使落后赶上先进，不富裕变成富裕。旧的差别改变了，新的差别又产生出来。这种你追我赶的革命竞赛，在党的领导下，早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开展之后，就已经广泛地发展起来，并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里，形成了欣欣向荣和朝气蓬勃的生动局面。事实说明，这种客观存在着的经济差别以及广大农民为改变这种差别所发扬起来的主观能动性，正是推动社会主义集体农业向前发展的伟大动力。

^① 《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页。



試談我國農村人民公社的級差地租

· 鍾 成 章 ·

編者按：我國一些經濟學者和農村工作者，正在討論農村人民公社內部存在的經濟差別問題。在討論中，有的同志試圖用馬克思關於級差地租的理論來闡述這一問題。鍾成章同志的這篇文章就是其中的一種意見。現在本刊發表出來以供大家進一步展開討論。

在我國農業生產中，常有這樣的情況：各個人民公社、各個生產大隊和各個生產隊在同等面積土地上投入同量勞動和資金，會得到不同量的生產品。有的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得的多，有的得的少。這就是說，有的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可以多得一部分純收入。這部分額外的純收入，是造成各個公社之間、各個生產大隊之間和各個生產隊之間經濟上存在差別的一個重要因素。為什麼會有這部分額外的純收入呢？怎樣看待這部分額外的純收入呢？這是當前指導農業生產和處理農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特別是處理生產大隊內部各個生產隊之間的收益分配，所面臨的一個十分重要又極其複雜的問題。在學習政治經濟學的過程中，我們感到馬克思關於級差地租的理論，對於解決這個問題很有幫助。當然，馬克思所闡述的是資本主義的級差地租，但是它完全可以作為我們今天研究現實問題的理論嚮導。

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級差地租時指出，資本主義的級差地租是資本主義農業生

產中的超額利潤。這種超額利潤的產生，有它的自然條件和經濟條件。在資本主義農業中，由於土地肥沃程度不同，土地離市場的遠近不同，土地上追加投資的生產率不同，農業資本家經營的各個農場之間必然會產生種種差別。這種差別可以歸結為優等地和劣等地的勞動生產率的差別，能夠給等量的資本帶來不同的利潤。這樣，經營優等地的農業資本家，就可以經常得到一部分超額利潤。由於土地肥沃程度較高、位置較優而得到的超額利潤，構成級差地租第一形態；由於土地上追加投資的生產率較高而得到的超額利潤，構成級差地租第二形態。

優等地和劣等地的勞動生產率的差別，僅僅是產生級差地租的物質條件。級差地租的產生，還有它特定的社會條件。馬克思說過：“地租是實行土地經營時那種社會關係的結果。它不可能是土地所具有的多少是經久的持續的本性的結果。地租來自社會，而不是來自土壤。”^① 資本主義級差地租產生的社會條件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和對土地作為

^① 《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0頁。



經營對象的資本主義獨占。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占統治地位。農業資本家生產農產品不是為了自己消費，而是為了出賣，也就是說，不是為了取得農產品的使用價值，而是為了取得農產品的交換價值，為了獲取利潤。農產品作為商品，要按照統一的市場價格出賣。在資本主義的農業生產中，土地分別為各個農業資本家獨占使用。土地作為經營對象的獨占，就是說一塊土地不能既被這個資本家占用，又被那個資本家同時占用，就是說資本家不可能在任何時候突破現有農場的數目建立新的農場。由於土地有限和土地經營的資本主義獨占，就使農產品的市場價格不取決於中等地的生產條件，而取決於劣等地的生產條件。這種市場價格，使經營劣等地的農業資本家能夠抵償生產費用，並且取得所投資本的平均利潤，而經營優等地和中等地的農業資本家除了能夠抵償生產費用並取得所投資本的平均利潤以外，還能夠得到超額利潤。這部分超額利潤便構成資本主義的級差地租。資本主義級差地租，由農業資本家從農業僱傭勞動者那里榨取出來，然後以土地租金形式轉交給土地所有者——地主。

根據馬克思關於級差地租的理論，在我國社會主義農業中，存在不存在級差地租呢？這就必須具體分析在當前農村人民公社中，存在不存在形成級差地租的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

解放以來，我國農業生產有了迅速的發展，耕地面積逐年擴大，大量土地的肥沃程度不斷提高，農田水利建設和交通建設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土地肥沃程度的差別並沒有消失，而且也不會消失，正如馬克思

所說的：“土地總面積的絕對豐度的增進，不會廢止這種不等，而是增大它，或任其照舊不變，或只是縮小它。”^①同時，土地位置也有差別。當然，我們這裡所說的土地位置的差別，指的不只是土地距離市場的遠近不同，而且也是指土地距離居民點和交通綫的遠近不同。因為土地距離居民點和交通綫遠近不同，生產耗費就不一樣，從而純收入也會不一樣。隨着我國工業生產的巨大發展，幾年來工業為農業提供了相當大量的技術裝備，有力地促進了土地集約化經營程度的提高。但是我國各個地區，在技術裝備程度、農田水利建設的進度和土地上追加投資的數量等方面，都是有差別的。所有上述情況都說明，我國目前仍然有產生級差地租的物質條件。

在我國不僅存在着產生級差地租的物質條件，而且也存在着產生級差地租的社會條件。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我國目前存在着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形式——全民所有制的國營企業和集體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實行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的按勞分配制度。這些條件決定了我國依然存在着商品生產。在商品生產的條件下，農村人民公社各個生產單位與外部的經濟聯繫，就要按照等價交換的原則來進行，各個生產單位也必須運用價值形式來計算生產的消耗和成果。因此，農村人民公社各個生產單位的農產品，儘管有相當大的部分用來做為社員的消費品，却不能不具有價值形式。我國農村人民公社的土地屬於生產大隊所有，而固定給生產隊長期使用，其他生產資料大部分歸生產隊所有。固定給生產隊長期使用的土地，雖然不能出賣、

^①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62頁。



出租，生产队实际上是把它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因此，生产队凭借这些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经营所获得的成果，就是该队的集体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又由于优等地的数量有限，不能不耕种劣等地，就使经营优等地和中等地的生产队，比经营劣等地的生产队，能够经常地多得一部分农产品。这部分农产品，如同全部农产品一样，不能不具有价值形式，因而也就表现为这部分生产队所获得的额外纯收入。这一部分额外纯收入，就构成社会主义的级差地租。

但是，社会主义的级差地租，它的性质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级差地租。资本主义的级差地租，是农产品个别生产价格与社会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是剩余价值的一个特殊形态，它尽管是农业工人劳动创造的，却被经营土地的农业资本家所窃取，并以地租金的形式转交给土地所有者——地主占有（在租约有效期内，其中一部分为农业资本家占有）。它是剥削阶级无偿占有的农业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果实，它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而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中的级差地租，则是农产品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它是摆脱了剥削的公社社员集体创造的，是社员集体劳动的果实，而且也归社员集体所有。它并不采取地租金的形式交给任何人，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中也存在着级差地租；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它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级差地租。不同社会的级差地租，反映不同的生产关系，决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

有人认为，级差地租是地租的一种形态，地租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它体现着一

种剥削关系，只有在土地所有权和劳动者分离的条件下，才会产生地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个条件是不存在的，因而就不可能有级差地租。当然，历史上地租的各种形态，往往是和土地所有权与劳动者分离相联系的，而且不论封建地租或是资本主义地租，的确都反映了一种剥削关系。但是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没有这个条件就不会有级差地租。根据马克思关于级差地租的分析，这个条件和级差地租的形成并不是必然地联系着的。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耕种自己土地的小农，也能获得级差地租。他说：“不管在这里土地生产物的平均市场价格是怎样规定的，级差地租，即丰度较大或位置较优的土地所有的商品价格超过部分，在这里，必然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一样，是明明白白存在的。即使这个形态是出现在还没有一般市场价格发展的社会状态内，这个级差地租也是存在的；在这条件下，它是表现为多余的剩余生产物。不过它是流入那些在较有利自然条件下实现他的劳动的农民口袋里。”^①这里土地所有权和劳动者并不分离，也不存在剥削，可是马克思却认为级差地租是“明明白白存在的”。土地所有权和劳动者分离，并不是产生级差地租的必要条件，它只是使这部分级差地租不归创造它的劳动者所有，而采取地租金的形式转交给土地所有者占有的条件。

二

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中的级差地租，是公社社员集体创造的，也归社员集体所有。农

^①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50—1051页。



村人民公社是各个生产大队联合组织起来的集体经济组织，在现阶段实行三级所有、三级核算的制度，级差地租在公社之间、生产大队之间的分配问题已经解决。现在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主要是生产大队内部的各个生产队之间级差地租究竟应该怎样分配的问题，特别是在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情况下，应该怎样分配的问题。在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情况下，各生产队的收入，一般都要上交生产大队，那末，在生产大队的统一分配中，级差地租是归各个生产队平均占有呢，还是归创造它的生产队占有呢？这个问题是有一定的复杂性的。级差地租的存在是造成当前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经济差别的一个重要因素。对级差地租的分配处理得好，就能合理地体现这种差别，就不会在分配上产生平均主义。显然，这对调动生产队的积极性，对维护生产队之间的团结，对发展生产，都是有利的。

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告诉我们：两种不同形态的级差地租，形成的物质条件是不同的。级差地租第一形态的形成，是同使用自然条件较有利的土地相联系的，这部分级差地租按说应该归于土地所有者。但是如前所说，在农村人民公社中归生产大队所有的土地，长期地固定给生产队使用。实际上生产队是把固定给它使用的土地当作自己的生产手段来支配，而无须向生产大队付出任何代价。因此，由于使用自然条件较好的土地而形成的级差地租，就应该归使用这些土地的生产队所有。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这样做也是切合实际的。自从土地改革以来，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直到人民公社，

在这样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生产队的社员都在这些土地上劳动，由于这些土地自然条件好而带来的级差地租，首先是通过他们的劳动创造的，而且在过去较长时期内都基本上归他们所有。现在如果把这部分级差地租交给生产大队，那就必然会影响这些队的社员收入的增长。同时，正因为他们长期在这些土地上劳动，因此这些土地就包含有他们的劳动成果。换句话说，这些土地的现有条件，也不完全是自然形成的，它是和人们长期的合理经营分不开的。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在处理级差地租分配时，一般情况下要把使用自然条件较好的土地所形成的级差地租，留给生产队，否则就会导致平均主义，使多产的生产队不能多得，从而影响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级差地租第二形态的形成，是和追加投入生产资料和劳动、从而造成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相联系的，是和土地的集约化经营相联系的。追加投入生产资料和劳动，实行集约化经营，就是在土地的一定土质、位置等条件的基础上，大力进行土壤改良、兴修水利、追施肥料、采用新式农具、修建道路、广泛利用科学成就等等。这一系列工作，目前主要是依靠生产队的力量来完成的。所以，这部分级差地租应该基本上归生产队所有。如果不是这样，把由于生产队追加投入生产资料和劳动所形成的级差地租也归生产大队所有，那必然会挫伤生产队进行土壤改良、兴修水利、追施肥料、采用新式农具等等追加投入生产资料和劳动的积极性。这种做法同样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不利于鼓励生产队实行精耕细作。当然，如果生产大队对土地进行了投资，例如，在



全大队范围内兴建农田水利，实行机械化耕作，修建道路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级差地租第二形态，有一部分就应该归生产大队所有。除此之外，如果公社和国家也对土地进行了投资，由此带来的级差地租，当然也应该分一小部分归公社、国家所有。

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级差地租的各种条件往往同时存在，并且相互交错地发生作用，所以在某个生产队所创造的级差地租中，很难划分出哪些是级差地租第一形态，哪些是级差地租第二形态，更难准确地地区别出哪些级差地租是依靠生产队的经济力量形成的，哪些级差地租是依靠生产大队的经济力量形成的。上面的分析，只是为了从原则上弄清楚在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中，级差地租究竟应该怎样分配，才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

农村人民公社级差地租的分配，是和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的收益分配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在农业生产的收益分配以外，单独地实行级差地租的分配。根据前面的分析，级差地租分配的原则，一般情况下绝大部分要归生产队所有。至于在农业生产的收益分配中怎样贯彻这个原则，使级差地租为创造它的生产队获得，就需要从各地的不同情况出发，分别处理。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想对两种类型的生产大队的收益分配方法作一些分析。一种类型是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分配由生产大队统一进行。这种生产大队的集体经济力量一般比较雄厚，几年来修建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农田水利工程，添置了不少大型

农具，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生产资金；同时各个生产队之间原来的自然差别和经济差别较小，它们的生产发展水平大体上趋于平衡。这种生产大队，过去一般都是采取“三包一奖”的经营管理方法，实现生产大队的统一分配。“三包一奖”就是生产队向生产大队包产、包工、包成本，年终生产队把包产以内的收入全部交给生产大队统一分配，超产部分全部或者大部分作为奖励归生产队所有。超产是生产队积极经营的结果，因此其中可能包含一部分级差地租。超产部分既然归生产队所有，其中包含的级差地租自然可以为生产队获得。但是，“三包一奖”往往还不能很好地照顾各个生产队之间的差别。因为农业生产的种类繁多，条件复杂，“三包”往往不能做到准确；“三包”即使准确，但包产指标是根据生产队的土质、水利等条件，同时考虑到生产队的劳动力、畜力等条件确定的，因此包产以内的收入也包含一部分级差地租。包产以内的收入要统一分配，级差地租就不能为创造它的生产队获得。同时，包工指标是根据实际需要确定的，但产量和用工常常不一致，有的生产队产量包得多，用工包得少；有的生产队产量包得少，用工包得多，年终按包工分配，结果包产多、包工少的生产队不仅级差地租分不回来，甚至收入也可能少于包产少、包工多的生产队。

由于存在以上一些问题，有些生产大队在“三包一奖”的基础上，又采取了一些补充的办法，例如采取“以产计工”的办法，确定包工。产多，工多，分得的产品也多。这种“以产计工”的办法使“三包一奖”推进了一步，可以使包产以内的级差地租，不致完全被各



个生产队平均占有。但产量多的生产队和产量少的生产队，它们的收入上交給生产大队，經過統一分配之后，产量多的生产队，虽然分得的較多，級差地租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归生产大队所有。后来有些生产大队采取“包上調”的办法，使包产以內的收入，留一部分給生产队，这部分包括种子、口粮、生产队的生产費用等，其余上調大队。上調任务在包产时即定死，以后生产队多产不多調，少产不少調。这个办法使生产队的收入只有一部分上交給生产大队統一分配，另一部分則由生产队自行支配。因此“包上調”的办法，能够更好地体现生产队和生产队的差别。但是包产以內收入終究还有一部分归生产大队統一分配，这部分中包含的級差地租（数量較少）仍然不能为創造它的生产队获得。前面提到，这些生产大队的集体經济力量較雄厚，生产收入較多，生产队之間的差别不大，通过統一分配，生产队的收入一般都能增加，因此只要繼續合理地解决各个生产队之間級差地租的分配問題，以及适当照顾其他差别，繼續坚持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对于这类生产大队生产的发展和社員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有利的。

另一种类型是，生产大队的集体經济力量不太雄厚，各个生产队之間的自然差别和經济差别較大。这类生产大队經過总结实践經驗，深入与群众商量，已經試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試行中提出的分配办法很多，“大包干”是比較普遍的一种。“大包干”的办法，一般是生产队每年的生产收入，除了按照生产大队的統一規定，提出一部分作为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費上交給生产大队以外，其余的全部由生产队自行支配。这种

“大包干”的办法，使得生产队既是个生产的单位，又是个分配的单位，生产和分配在这里得到了統一。实行这个办法，級差地租归生产队所有的問題实际上就完全解决了。从合理处理級差地租分配的角度来看，这类“大包干”的办法比較簡易，也能够比較彻底地解决农业生产收益分配中的承认差别的问题。因而这个办法必然会提高富队的积极性，增加他們对土地进行追加投入生产資料和劳动的兴趣，鼓舞穷队下决心自力更生，赶上富队。同时，实行这种“大包干”的办法，不論对富队或穷队，都适当地扩大了它們的經济权利，使它們更能够充分利用本队的生产条件，挖掘潜力，勤儉节约，促进生产迅速发展。

在生产队实行上述办法的情况下，那些由于国家、公社或生产大队向生产队投入了資金和生产資料而形成的級差地租，怎样合理地从生产队提取一部分，归国家、公社或生产大队所有，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問題。国家、公社或生产大队向生产队投入資金和生产資料，一般有几种方式：一种是兴建一些农田水利工程，如水庫、灌溉渠道等，交給生产队使用。由此获得的級差地租，可以采取提成的办法，由受益的生产队，按受益大小，适当上交一部分給投資的单位。一种是直接經營一些农业設施，如拖拉机站、排灌站等，供生产队使用。由此带来的級差地租，有一部分可以附加在使用費中，为投資經營的单位获得。此外，有时向生产队投入資金和生产資料，是作为对穷队的支援。在这种情形下，显然就不需要分出一部分級差地租給投資的单位。

合理地分配級差地租，是一項細致的經



济工作。要做好这项工作，不仅需要明确的分配原则，而且需要有妥善的分配方法。级差地租的分配原则，一般情况下应该是基本上归生产队所有。贯彻执行这个原则的方法，则是多种多样的。几年来，各地在这一方面已经创造了许多良好的经验，有助于我们进行分析、比较，对于那些比较完善的方法加以总结、提高，对于那些还不够完善的方法加以补充、改进，从而把农村人民公社的经济工作，提到更高的水平。

四

级差地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它将长期存在。它的存在总是反映着生产单位之间的差别。正确地分配级差地租，实质上就是一个承认差别和照顾差别的原则问题。只有承认和照顾各生产队之间的差别，正确地分配级差地租，我们才能充分调动农村人民公社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才能更好地促进生产的发展。只有随着生产的迅速发展，我们才有可能逐步缩小各个生产队之间的差别。由此可见，分配与生产是密不可分的，分配决定于生产，又影响着生产。这就是我们所以要特别重视级差地租分配的道理。

穷队和富队差别存在的根本的标志是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因此迅速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缩小穷队和富队差别的重要途径。这就要求所有的生产队，尤其是生产条件比较差的生产队，在现有条件的基础上，积极努力去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

当然，生产条件比较差的生产队，在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中，会遇到较多的困难。但是也应当看到，像这样

的生产队，往往发展生产的潜力也是较大的。在一般情况下，追加投入同量的劳动和资金，对于条件较差的生产队比对于条件较好的生产队，会发生较高的增产速度。条件较差的生产队的社员对于改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有着更加迫切的要求，从而可以发挥出更大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在我们国家里，条件较差的生产队不是孤立无援的，它们可以得到国家、公社、生产大队的支援，以及在等价交换的原则下，得到其他生产队的支援，这种支援是多方面的，从生产经验到财政援助。因此，条件较差的生产队，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善于挖掘生产潜力，劳动生产率就可以大幅度的提高，农业产量和生产收入就可以逐步赶上条件较好的生产队。

随着生产队的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特别是条件较差的生产队的劳动生产率以更大的速度提高，各个生产队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也将会逐步缩小，各个生产队之间的级差地租的差距也将会逐步缩小。这就是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随着生产的不断高涨，广大社员将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前进。

在目前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级差地租确实是在我们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着的，我们应该正视它、研究它。只有通过深入的研究，才有可能在经济活动中充分估计它的作用，利用它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本文只就社会主义级差地租产生的条件、性质，级差地租的分配以及它的发展趋势等问题，提出自己初步的看法，希望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兴趣，以便共同作进一步的探讨。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級差地租問題的討論

我国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内部各生产大队之間，生产大队内部各生产队之間存在的經濟差別問題，引起我国經濟學界的研究兴趣。有的同志试图用馬克思关于級差地租的理論来闡述这一經濟現象。安徽省和湖北省的一些經濟学者和农村工作者，今年六月以来已就这个問題展开討論。《光明日报》、《江汉学报》等报刊也登載了討論这个問題的文章。討論涉及的主要問題包括：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否存在級差地租，社会主义制度下級差地租形成的条件和性质，級差地租如何分配等。

在討論中，大家一致认为，由于土地肥沃程度和位置的不同，以及对土地追加投資的生产率不同，而造成的土地收益上的差別，是形成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各生产大队、各生产队之間經濟差別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这种土地收益上的差額是不是級差地租，却有不同的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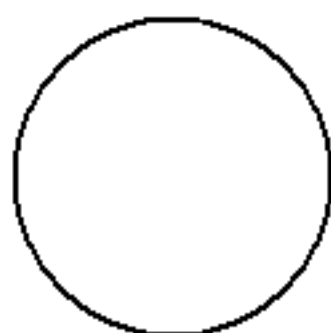
一种意見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經不存在級差地租，这种土地收益上的差額，只是一种“級差土地純收入”。所謂級差地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它反映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租佃資本家和地主各自凭借自己占有生产資料的权利，共同分割农业雇傭劳动者所創造的剩余价值的这样一种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特定的社会經濟条件已經不存在了，因而級差地租也就不再存在了。在不同公社、不同生产大队和不同生产队之間，由于土地的肥沃程度和位置不同，以及在土地上連續追加投資的生产率不同而形成的收入的差額，是以級差土地純收入的形式表現出来的。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集体和社員之間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和局部利益的差別性。^①

另一种意見认为，級差地租作为一个經濟范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是存在着的。馬克思在分析級差地租的时候，虽然是把它作为資本主义的地租形态来分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馬克思认为級差地租仅仅是資本主义所特有的經濟范畴。因为在社会

主义社会，供作农业生产用的土地，也还因为土地肥沃程度和位置的不同，以及土地集約化經營程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在肥沃程度較高、位置較优的土地上的劳动，就能創造出級差地租Ⅰ，在集約化經營程度較高的土地上的劳动，就能創造出級差地租Ⅱ。持有这种意見的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級差地租，是农业生产中的一种补充純收入。工业和国民經济其他部門的企业，由于經營管理得較好，节省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消耗，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产品成本，都有額外純收入的产生。在农业生产中同样也有这种額外純收入的产生。不同的是，工业和国民經济其他部門的企业所得到的額外純收入，是一种临时性、不固定的收入。作为級差地租的补充純收入，不是临时性的，而是长久性的。它不是单纯由于經營管理得較好的結果，而是有其特有的自然基础。^{②③}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級差地租形成的条件問題，也有几种不同的意見。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級差地租的人，一般都认为級差地租的形成一方面有自然的和經濟的条件，另一方面有社会的条件。但是对社会条件的說明，則是不相同的。

一种意見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形成級差地租的自然的和經濟的条件是：土地肥沃程度和位置的不同，以及土地集約化經營程度的不同，从而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但是，仅仅具有这些自然条件和經濟条件，还只是有了形成級差地租的物质基础，而要形成級差地租，还必须凭借一定的社会条件。这就是生产資料和产品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以及由此派生的社会主义集体經济对于土地經營的壟断和商品生产与价值規律的存在。沒有土地經營的壟断，土地生产物的价格就不会取决于劣等地的生产条件，就不会有級差地租。沒有商品生产与价值規律的存在，土地生产物的价格就无从依据“虛假的社会价值”来决定，也就不会有級差地租。然而，一定形式的土地經營的壟断，一定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規



律作用的性质，又要受一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所有制的性质所制约。因而，社会主义制度下形成级差地租的最终原因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②

一种意见认为，形成级差地租的直接的社会原因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土地经营者作为商品生产者，农产品作为商品。因为，如果没有同种商品的市场价格的同一性，没有同种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即使在不同肥沃程度的土地上生产出不等量的生产物，也不会发生级差地租。现阶段我国农村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组织。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经济联系以及人民公社之间的经济联系，主要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的。此外，人民公社还在国家所规定的范围以内，通过在自由市场上出售农产品和消费者直接发生经济联系。国家向人民公社收购农产品的价格，大体上是农产品的社会价值为基础的。自由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也基本上以农产品的社会价值为调节。那些土地较肥沃、距离市场较近或者在经营管理上有较高投资效果的生产单位，它们的农产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而又按照以社会价值为基础的国家收购价格或以社会价值为调节的自由市场价格出卖，便会得到一种额外的补充收入。这种额外的补充收入就是级差地租。^③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形成级差地租的直接的社会原因不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而是对作为经营对象的土地的垄断。从表面上看来，级差地租是由于土地生产物的个别生产价格与一般生产价格之间有一个差额形成的，但是为什么这之间会有一个差额，并且会比较牢固地存在，根本原因在于有对作为经营对象的土地的垄断。^④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级差地租形成问题的讨论中，还涉及到级差地租仅仅发生在商品性产品部分呢，抑是发生在全部产品(包括自给性产品部分)中的问题。

有的同志认为，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单位从土地上以实物形式得到的补充纯收入不是级差地租，而只是级差地租的物质基础。有的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人民公社生产物中的商品部分和自给部分，在事实上很难截然分开。有时产品在公社或生产大队外部看是自给性产品，在内部看又是商品；有

时产品被作为消费对象分配给生产队或社员了，而当生产队或社员拿去出售时，它又由自给性产品变成了商品；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下，自给性产品也必然会带有商品的形式，因为自给性生产也需运用价值形式作为统一的经济核算工具。只要有商品——价值关系的存在，只要农产品有一部分作为商品，在不作为商品出售的农产品中，也是可以包含有级差地租的。^⑤

此外，关于土地生产物的社会价值如何决定的问题，也引起了讨论者的注意。

有人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土地生产物的社会价值不能依然取决于劣等地生产物的价值，而必须取决于中等条件土地生产物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刺激经营劣等地的农业生产者去注意劣等地的改良，才能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另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农产品的社会价值，依然不能不取决于劣等地生产物的价值。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关系状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商品货币与价值规律的作用所决定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造成两种后果：要末使经营劣等地的农业生产者亏本，甚至导致农业生产力的破坏；要末迫使国家支出大量财政补贴，使国家财政开支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不利影响。^⑥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级差地租的性质，讨论者多认为它不再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一个特殊形态，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中的一种补充纯收入，它由劳动者自己创造，并完全归劳动者所有。

关于级差地租的分配问题，引起讨论者很大的重视。大家认为，级差地租既然是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各生产单位之间经济差别的一个重要因素，能否合理分配级差地租，就成为贯彻执行党在农村人民公社中的分配政策，避免产生平均主义，充分调动各生产单位的生产积极性，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根本制度的关键问题之一。

级差地租的分配，由于涉及到国家、公社、生产大队以及生产队之间的关系，大家认为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对于国家通过农业税、农产品收购的地区差价等形式，收取一小部分级差地租归全民所有，公社通过从不同生产条件的生产大队提取不同量的公积金、公益金等形式，收取一小部分级差地租归



全公社集体所有，大家一般都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应该的，在这方面没有意见分歧。问题在于级差地租在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这两级之间如何分配。是归直接经营土地的生产队所有呢？还是归生产大队所有，然后由生产大队统一平均分配给各生产队呢？

由于级差地租产生的原因不同，表现为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这样两种形态。讨论者一般从级差地租产生的不同原因出发，提出了对于这两种形态级差地租如何进行分配的意见。

首先是关于级差地租Ⅰ的分配问题。讨论中大体上有以下几种主张：一种主张，认为级差地租Ⅰ是发生于肥沃程度较高和位置较优的土地上，是由自然界和社会的力量所提供的，因此应当归社会所有，或者说归国家所有，而不应当归生产大队或生产队所有。另一种主张，认为生产大队是级差地租Ⅰ赖以发生的自然力的所有者，所以它应当基本上归生产大队所有，并由生产大队统一平均分配给各个生产队，或者由生产大队直接掌握、使用。再一种主张，认为级差地租Ⅰ的形成尽管是以自然力为基础，但是自然力不是级差地租的源泉，劳动才是级差地租的源泉，如果不是经营土地的生产队投入劳动，自然力就不会自己发生作用，因此，级差地租Ⅰ应当基本上归直接经营土地的生产队所有。

其次是关于级差地租Ⅱ的分配问题。讨论中多数人的意见倾向于这部分级差地租应当基本上归生产队所有，因为它发生于集约化经营程度较高的土地上，一般是直接经营土地的生产队投入资金和劳动的结果。但是也有人认为，土地集约化的经营，一方面固然和生产队投入资金和劳动分不开，另一方面却也和国家、公社，特别是和生产大队的扶持、支援和投资分不开。譬如一些原来自然和经济条件不好的生产队，经过国家、公社、生产大队的帮助，逐步改变了面貌，在这些生产队发生的级差地租，就不应当基本上归生产队所有。还有人认为，级差地租Ⅱ发生的基础和出发点，终究是级差地租Ⅰ，如果级差地租Ⅰ应当基本上归生产大队所有，那末级差地租Ⅱ也同样应当基本上归生产大队所有。

讨论还涉及采取什么样的分配制度才能更好地体现级差地租的分配原则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

应当坚持生产大队统一分配，把级差地租随同生产队的其他收入一起由生产大队集中起来，然后通过“三包一奖”的孔道，分配给生产队。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生产大队的基本所有制，体现它的土地所有权。在生产大队统一分配中，如何通过“三包一奖”的孔道合理分配级差地租，讨论中提出了若干不同的办法，如对于创造级差地租的生产队降低包产指标，提高包工工分等。一般认为，采取提高包工工分的办法，更加能够实现级差地租基本上归创造它的生产队所有。在提高包工工分的方法方面，又有多种多样的主张，如“以产计工”、“以包产计包工”、“以包产计包工与以实际需要用工计包工两结合”、“以包产计包工、以实际需要用工计包工与以劳动底分计包工三结合”等等。关于分配制度的另一种意见，认为既然级差地租分配的最后结果是要基本上归创造它的生产队所有，就不必采取由生产大队集中起来，然后又通过“三包一奖”进行分配的烦琐方法，而应该直接由生产队分配。持有这种意见的人认为这样做并不与土地所有权相矛盾，因为土地的生产大队集体所有制，正意味着每个生产队作为集体的成员都享有一份土地所有权；这样做，恰恰使产品分配权和土地所有权、土地经营权统一起来了。有人还指出，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论述，级差地租的产生和土地所有权无关，而仅仅与土地经营的垄断有关，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级差地租的分配首先要考虑的是土地经营权的问题。^⑤

（顾明辑）

- ① 见《试论级差土地纯收入及其分配》，1961年9月18日《光明日报》。
- ② 见《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级差地租》，《江汉学报》1961年第2期。
- ③ 见《对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级差地租问题的初步探索》，《江汉学报》1961年第1期。
- ④ 见《关于级差地租存在条件的初步认识》，《江汉学报》1961年第3期。
- ⑤ 关于级差地租分配问题的各种意见，除见以上各篇外，还见《关于级差地租讨论的意见》，1961年9月18日《光明日报》。此外，还包括有些地方座谈会讨论中的一些意见。

